



中外名人传记百部

ZHONG WAI MING REN ZHUAN JI BAI BU

# 恩格斯传

北京圣碟科贸有限公司制作

世界名人传记

# 恩格斯传

X X X 编著

## 目 录

- 第一章 童年和青年时代的恩格斯.....002
- 第二章 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017
- 第三章 在革命浪潮中的恩格斯.....036
- 第四章 第一国际前后的恩格斯.....086
- 第五章 马克思逝世后的恩格斯.....115

## 第一章 童年和青年时代的恩格斯

1820年11月28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诞生于巴门市一个纺织工厂厂主的家里。

恩格斯的故乡——普鲁士的莱茵省是当时德国工业最发达的地方。那时，在德国其他地方，手工业、手工劳动还占统治地位，但是在莱茵省，第一批机器已经出现，工厂也已经产生了。莱茵省是诞生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大工业在德国胜利进军的第一个地方。

工厂制度给劳动群众带来了新的沉重的灾难，带来了更严重的贫困和更残酷的剥削。机器使厂主能以空前的规模使用女工和童工劳动；报酬低微的女工和童工劳动的竞争使得成年男工的工资也降低了。莱茵省也像其他各处一样，在那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来的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破产。

童年时代在故乡乌培河谷所看到的贫困和苦难的情景给恩格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使他毕生难忘。1839年，恩格斯写了 he 最初的政论作品《乌培河谷来信》，在这部著作里，恩格斯对巴门和爱北斐特的工厂工人和手工业者的困苦状况做了鲜明的描写。

19岁的恩格斯怀着深切的同情描写了那种极端

贫困的现象，特别是乌培河谷工厂工人的极端的贫困；他对工厂中普遍使用童工劳动表示极度愤慨。那时，只在爱北斐特一地，2500个学龄儿童中就有1200人不能入学。他们在工厂中长大，所得的报酬只及成年男工的二分之一。恩格斯指出，工厂中的工作是在非常恶劣的条件下进行的，它不仅摧残童工的健康，而且还摧残成年工人的健康。恩格斯认为造成工人的贫穷和苦难的主要原因是“厂主们的胡作非为”。

乌培河谷这个“德国的曼彻斯特”是纺织工业的巨大中心，同时也是宗教的愚昧和迷信的中心，虔敬主义——新教中最顽固最伪善的一派——的堡垒。“伪善的河谷”，恩格斯在青年时代所写的一封信中就是这样称呼乌培河谷的。圣经和烧酒，乌培河谷的厂主和师傅们就用这些东西来“装饰”工厂工人和手工业工人的生活，使他们放弃斗争、屈从现存的秩序。

恩格斯以后在回忆时写道：既然那时乌培河谷的工人们只能在小酒店的人间烧酒和虔诚的神甫的天堂烧酒之间进行选择，那么无论前者如何糟糕，他们还是宁愿选择它，这是毫不足怪的。

在乌培河谷，“社会舆论”是由伪善的传教士决定的。在教徒的集会上可以成立审讯“异教徒”的正式法庭；而一切不参加宗教集会、平时看看小说或参加音乐会的人都被认为是异教徒。学校中的教育也是

根据这种精神来进行的。恩格斯先生在巴门上理科中学，后来又在爱北斐特上市立中学；他记得，当时有一个学生问先生，歌德是怎么样一个人，先生回答他说：“是一个不信神的人。”

这就是这个富于感受力和洞察力的孩子成长起来和接受教育的社会环境。

恩格斯当时的家庭环境也并不更好一些。他父亲是一个虔信宗教和非常专制的人。恩格斯的全家，包括他的善良、慈爱但性格软弱的母亲在内，在这位专制暴君面前都是战战兢兢的。求知欲旺盛、性格刚强的弗里德里希在早年就显示了他的机智、聪明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样他就成了家里的“丑小鸭”。从一封偶然保存下来的恩格斯的父亲给他的母亲的信中，可以看到他们对于这个15岁的儿子的教育是如何忧虑：

“上星期弗里德里希的学习成绩是平平的。你知道，他在表面上看来已规矩了些，但是过去一切严厉的惩罚显然都不能使他慑于恐惧而完全听话。今天他又使我为他担忧：我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了一本肮脏的书，这是一本从图书馆借来的关于13世纪游侠故事的小说……愿上帝保佑他吧，总的说来，他是个好孩子，但我总为他担心，怕他堕落。他固然有一切美好

的品质，但到目前为止，我还发现他有些意志薄弱和思想上的浮泛，这使我深为不安。”

他那狂信宗教的父亲的笔下的“意志薄弱和思想上的浮泛”，实际上就是指恩格斯还在孩童时代已经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力图突破周围那种伪善的环境。

这个有才能的少年在学校里对文学、艺术、音乐、外国语表现了异常浓厚的兴趣。他写诗，也画漫画，而且画得相当成功。恩格斯天性是乐观愉快的，他在体力上显示了极大的耐久力和机敏。他醉心于骑马、击剑，同时他也是一个出色的游泳者。这种对运动对锻炼体格的爱好，恩格斯是终生保持不变的。

1837年9月15日，由于父亲的坚持，恩格斯不得不在还没有读完最后一学年就离开中学并放弃进一步的学习。恩格斯的父亲一心希望自己的长子能在商界中飞黄腾达，因此想使他习惯于在商业部门中工作。恩格斯先在他父亲的营业所里工作了一年，以后又被送到不来梅的一个巨大的贸易公司去工作。

但是，营业所的工作并不能限制年轻的恩格斯。经商这样一种前途对他毫无引诱力。他把工作以外自由支配的时间用来进一步提高自己。就在那时候，他那极强的工作能力、他的善于合理地利用时间和安排自己的生活，已使人感到惊异。每天清晨，在上营业

所以前，恩格斯就一直在读书了。他写信给朋友时这样说：“在春光明媚的早晨，坐在花园里，含着一支烟斗，让太阳烤着脊背，再也没有比在这样情况下读书更愉快的了。”

在不来梅这个大商港，恩格斯可以找到大批英国、荷兰、斯堪的那维亚及其他国家的报纸。那时，恩格斯手头就有在德国被禁止的书报，他还把这些书报寄给住在巴门的朋友们。书报帮助恩格斯弥补了过去所受教育不足，扩大了他的视野。阅读外国报纸的同时也使恩格斯在学习外国语方面获得了惊人的成就。在给妹妹玛丽的信中，他夸耀他能用25种语言谈话。他常常给朋友写“多种语言”的信，那是用好多种语言混合着写成的。

的确，19岁的恩格斯就用所有这些文字写信，当然错误还是有的。

在不来梅，恩格斯曾醉心于诗歌的创作。他幻想着走巴门一商号雇员斐·弗来里格拉特的道路，后者在那时已经成为名诗人了。

过去恩格斯在乌培河谷的生活是寂寞的。现在他愉快地上戏院看戏，参加音乐会。他和过去一样，仍然从事游泳、击剑、骑马等运动。

年轻的恩格斯无论在不来梅或乌培河谷，都仔细地观察了劳动者的生活，他这样写道：“那些平民，

他们什么都没有，但是在一个国王统治的国家中，他们是最好的。”

恩格斯早年就对他诞生的那个社会圈子、对他成长的那种商人牧师环境中的观点和偏见抱批判的态度，他观察了人民的生活，狼吞虎咽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他的态度就更为激烈了。

恩格斯的父亲对儿子的发展倾向感到不安，就预先把他送到不来梅的一个牧师那里去。但是，弗里德里希正是在寄居于这位好客的牧师的家中时，对宗教发生了极度的怀疑，并永远结束了先辈传下来的信仰。

恩格斯在这时所经历的内心斗争，在他给友人格雷培兄弟的信中有极明显的反映。恩格斯做出了结论：圣经中有不可解决的矛盾而且要使科学和宗教调和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就坚决地和传统决裂，和他的家庭与朋友的世界观决裂。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说：“我知道这会给我引起极大的麻烦，但我既已为这种说服所束缚，即使我尽一切努力，也不能解脱……哪里存在着捍卫理性自由的问题，我就在哪里反抗一切强制行为。”

坚强的意志力、思想上的果敢和高度的原则性——这些特点在年轻的恩格斯给友人的信中已经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大卫·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对于恩格斯彻底和

宗教决裂起了极大的作用。这本书是1835年出版的，施特劳斯在这本书里否定了福音书中的基督的存在并证明福音书的内容是神话，是最初的基督教团体的创作物。在1839年10月8日给威·格雷培的信中，恩格斯说，他已成了“狂热的施特劳斯信徒”，在施特劳斯的影响下，他的信仰“显得像海绵一样漏洞百出”。

抛掉基督教的这件“约束疯人的紧身衣”，弗里德里希就感到自己获得了解放。他努力要得出一种新的世界观来代替“乌培河谷时代的信仰”，于是他开始更多地考虑政治问题。现在，童年时代的那些印象过去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聪明、天赋极高、勇敢而锐敏的青年人的观察和深思。革命前夜的德国及其邻国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给这种观察和深思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对年轻的恩格斯的观点的形成起了巨大的影响。

恩格斯的青年时代是他的世界观和他的政治观点形成的时候，正是西欧许多国家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期。1830年法国的七月革命就是这个斗争史上的转折点。虽然这一革命直接产生的实际结果对法国来说只是大财政家和大证券交易者的君主政体代替了贵族的君主政体，但是，这个革命的雷声响彻了整个欧洲，并打破了当时笼罩着反动势力统治下的整个欧洲

的那种沉寂。

法国七月革命的消息引起了经济上落后和政治上分裂的德国的某些地区人民的骚动。但是，起初张惶失措的德国各邦政府很快就镇定下来，并加倍猖狂的镇压对政治稍有不满的人们。死样的沉寂似乎又重新笼罩着德国。但这不过似乎是这样罢了。警察的任何迫害都已经压制不住国内人心的不满。德国30年代后半期和40年代初的特征，就是产生了各种反对政府的团体和派别。

黑格尔的左派学生即青年黑格尔派也属于这类反对政府的团体。恩格斯在1840年1月21日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说：“由于施特劳斯，我现在已经走在直接通往黑格尔学说的路上了。”他说他每天晚上都怀着强烈的兴趣阅读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但是，恩格斯自己在给格雷培的信中就写道，他不能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黑格尔派”。黑格尔的学说和黑格尔左派信徒们的思想都不能使他完全满意，因为他们局限在哲学问题和宗教问题中，远远地脱离了生活，脱离了实践，脱离了政治。在恩格斯看来“争取自由和权利的伟大战士”路德维希·白尔尼的思想正好弥补了这个缺陷。

19岁的弗里德里希的通信和他最初的文学尝试

证明这个青年具有政治积极性和革命情绪。他幻想那“旧世界完全毁灭”的一刻的到来，渴望“生活的顶峰——建立功勋”。

恩格斯的一些诗是在《德意志电讯》杂志上发表的，这个杂志是在海涅和白尔尼影响下的激进文学团体“青年德意志”的机关刊物。虽然这个团体在思想上还没有成熟而且它的政治观点还模糊不清，但是它那种使作家接近社会生活、使文学服务于政治的企图却吸引着恩格斯。但这并没有妨碍恩格斯对“青年德意志”的作家和诗人采取批判的态度。恩格斯嘲笑这个团体的代表人物在讲话的时候额上总爱现出“悲观厌世的皱纹”，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凄惨的音调和悲观的情绪。这种情绪对恩格斯来说是根本不相容的。尽管德国的“现在”暗淡无光，但是，恩格斯并没有失去锐气，他为即将来临的斗争欢呼，对胜利满怀信心。

恩格斯感到苦恼的是他未能用无可非难的诗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因此，他逐渐放下了诗人的“竖琴”，拿起了政论家的笔杆。

恩格斯用“弗·奥斯渥特”的笔名在《德意志电讯》上发表的论文，给读者留下了比他的诗作深刻得多的印象。例如《乌培河谷来信》在那些为恩格斯揭穿了伪善的剥削阶级中间掀起了一股怒潮。有些乌培河谷人乱加猜测，以为这些“通信”的作者是弗莱

里格拉特，另一些人却以为是《德意志电讯》的编辑谷兹科夫。谁也没有想到在一个可尊敬的巴门的厂主家里去找这个惊扰了乌培河谷蚂蚁窝的作者。恩格斯告诉他的朋友说他就是这些论文的作者，同时请求他们不要把这些话告诉任何人，“否则我将要陷入可怕的困境”。

恩格斯发表在《德意志电讯》的论文和他给朋友的书信证明他是一个热烈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从这些书信和论文中已经可以看到年轻的恩格斯对君主政体和那些犯罪的暴君是如何切齿痛恨，同时也可以看到他那雄伟的革命气概。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哪一个时代都没有比1816——1830年间国王所犯的罪行更多的了。几乎那时的每一个君主都应该处以死刑。”他怀着特别仇恨和鄙视的心情描述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最无用、最可恶、最该死的国王……”恩格斯就是这样批评他的。他结束这封信时惊叹道：“呵，我能够告诉你许多关于君主爱臣民的趣事。只有对那嘴巴被人民打得劈拍作响、宫廷里的玻璃如数为革命所粉碎的君主，我才能希望他办些好事。”

当然，恩格斯没有可能如此公开地在报刊上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但是在他的论文中他为反对君主政体、等级制度、贵族特权以及地主和官僚的横暴进行

着斗争。

恩格斯嘲弄那些炫耀自己家世的达官显贵：“每一寸骨肉都是贵族的，每一滴血液都是64对门当户对的婚姻的结晶，每一瞥都是挑战！”他尖刻地批评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并预见到被剥夺了土地的人民的怒火迟早会烧毁贵族等级的代表们和依靠这个等级的君主政体。为了对抗等级制度和贵族特权，恩格斯宣布了“没有任何等级，只有伟大的、统一的、平等的国民国家！”的口号。

恩格斯在他的许多论文中提出了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把当时经济上和政治上四分五裂的、由38个大大小小的邦组成的德国统一起来。恩格斯写道：“当我们祖国还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时，我们在政治上就等于零，社会生活、正确的主义、出版自由以及我们的其他一切要求就只会是一个注定了不能彻底实现的善良的愿望。”

恩格斯在为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德国而斗争时，反对普鲁士想在统一德国时取得统治权的企图。他宣布和德国的这一个最反动的邦进行无情的战争，并认为历史的洪流必然会冲毁“保守的普鲁士堤坝”。

恩格斯在不来梅经商时期写的论文和书信中所发挥的那些政治观点就是如此。由于恩格斯丢掉了“乌培河谷时代的信仰”，他和他以前在学校时的朋友之

间就产生了裂痕，现在，这些政治观点使这一裂痕更加深了。那些为恩格斯的政治观点吓坏了的朋友们企图“开导”他，但是遭到了他的严厉驳斥和嘲笑。恩格斯在1840年11月20日给威廉·格雷培的信中写道：“为什么你，一个在政治上昏睡不醒的人，要责难我的政治信仰呢？如果让你在你那个村教区过安安静静的生活——要知道，更高的目的你是不会有的——并使你能每晚和牧师的夫人和孩子们散散步，那你就会沉溺于安乐而不再想到胆敢非议现存制度的恶棍恩格斯了。呵，好一个英雄的后裔！”

这是恩格斯写给他在学校时的朋友们的最后一封信当中的一封。他不能不感觉到，在居留不来梅的两年多的时间内，在他和他的朋友们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两年多来恩格斯经过了一番内心的斗争，前进了一大步：丢掉了“乌培河谷时代的信仰”，开始研究黑格尔学说，用革命的观点来解释这一学说，从模糊地追求自由转向革命民主主义的观点。

年轻人的广阔的视野，他的勇敢的思想，革命的气概，对劳动群众的痛苦的深切同情，所有这一切使他远远地超过了周围人们的水平。

1841年春天，恩格斯为了马上去服兵役，就回到了乌培河谷。虽然富有的厂主的子弟花些钱就很容易使自己免服兵役，但是恩格斯却愿意去服满兵役

期限。他选择柏林作为服兵役地点。普鲁士首都虽然是一个枯燥的政府机关所在地，但是在这个城市里却有一个展开着热烈的辩论、沸腾着思想斗争的角落，这就是柏林大学。由于渴望参加这个“知识分子的大本营”并充实自己由自学得来的知识，恩格斯就动身到柏林去。

1841年秋，恩格斯到达了柏林，作为志愿兵加入了步兵——炮兵旅。他在这里亲身体会了普鲁士军事操练的一切“妙处”。但是，他从服兵役当中也获得了真正的好处，他仔细地研究了军事，并很快地成了一名炮手。自从恩格斯在库弗尔格拉班附近的兵营中受训时起，军事科学就成了他喜爱的一门课业。

在服役期间，恩格斯以旁听生的资格抽空在柏林大学听课，他特别注意哲学的讲演。当恩格斯到达柏林时起，在青年黑格尔派小组里进行过活动并被公认为他们中间独具超人的智慧和雄伟的气概的那个人已经不在这里了。

恩格斯到柏林后不久就热情地加入了左派黑格尔分子当时所进行的那些哲学上的战斗。1841年12月，他用“弗·奥斯渥特”的笔名在《德意志电讯》上发表了她的论文《谢林论黑格尔》；约在1842年3月间，他的没有署名的小册子《谢林和启示》出版了，随后很快又出版了第二本同样没有署名的小

册子《谢林——基督的哲学家，或变人间智慧为神的智慧》。恩格斯的所有这些著作都对谢林的反动唯心主义做了深刻的批判。

恩格斯的哲学著作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的著作不同的地方还在于这些著作充满了战斗的、革命的精神，充满了实际的、政治的性质。恩格斯很清楚地了解，这不是在和谢林做纯粹的哲学上的争论，而是在向普鲁士君主政体的支柱——保守主义、伪善和宗教黑暗势力开火。在这些阐明哲学问题的论文中已经可以感到革命风暴的来临。年轻的恩格斯为这革命欢呼并用以下的战斗号召结束他的小册子《谢林和启示》：

“我们将斗争和流血，我们将无畏地直视敌人的愤怒的眼睛并战斗到最后一息。难道你们没有看到我们的旗帜在山顶飘扬？难道你们没有看到同志们的刀剑在闪烁，钢盔在发光？他们的队伍从四面八方逼近，他们从平原奔向我们，他们在歌声和乐声中走下山岗。伟大的决定性的日子，各民族战斗的日子已日益接近。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些把著名的哲学家谢林批评得体无完肤的著作不是出自某个“博学之士”之手，而是出自昨天的不来梅的办事员和今天的志愿兵——炮手恩格斯之手。

在批判荣克关于现代德意志文学的讲演的一篇论

文中，恩格斯批判了“青年德意志”的代表人物的中间立场，批评他们缺乏政治积极性，在哲学争论中没有一定的观点，批评他们的文学作品缺乏思想性。

和“青年德意志”的彻底决裂，表明年轻的恩格斯在发展过程中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9月30日，恩格斯的兵役期满了。当他回到巴门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要他前往英国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纺纱工厂去实习经商。

显然，他父亲这样做，不仅是渴望儿子提高经商本领，而且还要使他脱离革命前夕德国日益紧张的气氛。虽然恩格斯还从来没有用自己的名字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但是他革命民主主义的观点，看来对他家里的人已不是什么秘密了。恩格斯是否反对过他父亲的计划，这点已不得而知。可能这个计划正是最符合恩格斯本人的愿望的。无论如何，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英国的居留，对年轻的恩格斯来说，不仅有极大的收获而且也成了他发展中的转折点。

## 第二章 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

1842年雾气弥漫的11月里的一天，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到达了伦敦。英国这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大机器工业的祖国和当时还很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德国是大不相同的，而那时英国首都和普鲁士首都之间的不同也正有如这两国之间的不同。

恩格斯非常专心、非常同情地研究了工人的状况，他们的生活、观点以及斗争的方式和方法。他不限于研究书刊和官方文件。恩格斯在附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前面的《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中写道：“……我愿意在你们的住宅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疾苦，亲眼看看你们的反抗你们压迫者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

恩格斯逛过伦敦、里子、郎卡郡的热闹街道，逛过工人栖身的住宅区。他特别仔细地考察了曼彻斯特，他在英国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那里度过的。在公余的时间他就从城里的商业区跑到工人区去。常常陪他去的是他所爱的一位姑娘，一个爱尔兰女工玛丽·白恩士，她是恩格斯在曼彻斯特认识的。当然除了玛丽，

没有人能替恩格斯做所谓“小爱尔兰”的向导，“小爱尔兰”是曼彻斯特的一个区，居民大都是爱尔兰工人。

德国诗人格奥尔格·维尔特有时也和恩格斯一起去，他曾写过一本关于英国工人状况的文集，文集的结尾他是这样写的：“我就此结束我关于英国无产者的很不完整的报道，所幸现在还有一位优秀的德国哲学家在从事仔细描写英国工人生活的工作，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是难以估计的。无论怎样，这位作家会比我更好地把各种事情逼真地介绍出来，因为他曾长期住在曼彻斯特这个无产阶级的摇篮，他比我有更多的机会去观察工人……”

恩格斯住在英国的时候正值宪章运动的高潮。恩格斯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来研究这个运动的：他参加了宪章派的会议和大会，和宪章运动左翼的领袖们建立了联系。左翼的一个领袖哈尼在许多年以后回忆道：当时一个仪表端正、讲得一口流利英语的年轻人走进了宪章派报纸《北极星报》（《NorthernStar》）的编辑部。他自称是《北极星报》的经常读者，对宪章运动很感兴趣。这个人就是恩格斯。

恩格斯到英国以后，还和社会主义者们即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学说的信徒建立了联系。他们是他们机关报《新道德世界》的撰稿人，他在

该报发表关于大陆上社会主义运动的论文。恩格斯在这些论文里，向英国工人介绍了法国、德国、瑞士等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介绍了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的观点，介绍了卡贝、勒鲁、蒲鲁东、魏特林观点。他简练地论述了康德、费希特、谢林等德国哲学家，论述了在整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登峰造极的黑格尔观点。恩格斯在评述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的学说及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学说时，除批评这些学说的弱点和缺点外，同时也指出了每一派学说贡献给世界文化宝库的值得肯定下来的东西。

当恩格斯在分析德国社会主义发展前途的时候，还存着这样的想法：被他描写为哲学民族的德国人，会通过自己特有的“哲学”道路达到共产主义，因此，在德国存在着在有教养的和有产的阶级中间建立共产党的条件。

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讲道，还在1842年秋天，黑格尔的一些左派门徒就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单单进行政治改革是不够的，只有经过基于集体所有制的社会革命，才能建立符合于他们的抽象原则的社会制度。在这些黑格尔左派分子中间，恩格斯也提到了马克思的名字，并且把他自己也算做一个。可见恩格斯在到英国去以前就向共产主义跨出了第一步，可是这种共产主义还是非常不明

显的、朦胧的。

恩格斯在居留英国的期间终于成了共产主义者。

恩格斯的观点形成过程中的这个重要阶段清楚地反映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这一著作发表在1844年2月巴黎出版的由卡尔·马克思和阿·卢格所主编的《德法年鉴》上。虽然恩格斯的这一作品还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它毕竟包含着天才思想的萌芽。马克思后来称恩格斯的这一著作作为天才的大纲，而恩格斯在1884年也写道，他对于自己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这一最早的作品是有些有些自豪的，尽管它有许多缺点。

在这一著作中，恩格斯为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因而也就是为从无产阶级立场批判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甚至其中最优秀的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都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是永恒不变的。恩格斯却和他们相反，如列宁所说，他“从社会主义观点出发，把现代经济制度的主要现象看做私有财产制统治的必然结果”。

恩格斯在批判那些用伪善的人道词句来掩饰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利益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距离我们时代越近的经济学家，越不老实。”他特别猛烈抨击了马尔萨斯反动的、仇视人类的“理论”，马尔萨斯硬说什么人口增长的趋势永

远超过人们所掌握的生活资料。因此，马尔萨斯把资本主义的疮痍病痛都归罪于自然界。恩格斯愤怒地揭露了“这个卑鄙下流的学说，这种对自然界和人类的可恶的诬蔑”。他证明人类所支配的生产力是无穷无尽的，证明科学日益使自然界服从人类。只是必须有意地利用这种生产力来为一切人服务。而这只有在没有私有制的统治，因而也没有贫穷和豪富这两个极端的社会里才有可能。

恩格斯向共产主义观点的转变，是和他这时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有密切联系的。

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答复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的问题而分成两大阵营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那些认为精神的发展决定自然界的发展、因而归根到底这样或那样承认创世说的人，构成唯心主义阵营。那些认为自然界是根本起源的人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派别。

恩格斯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转变，在他在英国写的著作中表现得尤为明确。例如在批评托·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一书的文章中，恩格斯从唯物主义的无神论的立场批判了作者想创立一种新的宗教——“劳动教”——的企图。恩格斯也批判了卡莱尔的唯心主义的哲学观点，即他所宣传的“英雄崇拜”、“真正贵族”的统治。

恩格斯向唯物主义立场的转变，从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文章里对英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英国各个阶级的物质利益是英国政治斗争的基础。他揭露了在英国政治舞台上彼此斗争着的各个党派的阶级性质和英国国家的阶级本质。恩格斯说明右派政党——托利党是贵族和反动僧侣的政党，自由主义的政党——辉格党是厂主和商人的代表，至于宪章派则是这样一个党派，它的原则是英国工人集体意识的表现。在发表于巴黎的德文报纸《前进报》上的《英国的状况·英国的宪法》一文中，恩格斯详细分析了使大多数工人居民不能参加选举的英国选举法，揭露了国会选举的内幕——农业区的选民要按照地主的意志投票，选举时到处流行着向选民行贿等等的一套办法，有产阶级就是用这些办法来保证自己的走狗选入国会的。恩格斯对“那末在实质上是谁统治着英国呢？”这一问题回答道：“是所有制。”为了说明“自由”英国的法律是怎样应用的，恩格斯引用了两句家喻户晓的英国谚语：“法律压迫穷人，富人管理法律”。恩格斯揭穿了英国宪法的阶级性和资产阶级“自由”的局限性，针对着这一切提出了真正的民主，这种民主是在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和私有制以后才会产生的。恩格斯写道，“这种民主的原则将是社会主义的原则”。

恩格斯把他研究英国生活、首先是无产阶级的生活和斗争的工作，在他的杰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做了总结。这本是他和马克思相识以后完成的，于1845年在德国出版的。正如恩格斯自己后来所指出的，这本书是他的反映着科学共产主义形成过程初期的一个阶段的早期著作。在这本书里，到处都还可以找到科学共产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但恩格斯的这一著作仍不失为世界社会主义文献中的一部优秀著作。

在这一著作中，恩格斯对产生了大机器工业和形成了工业无产阶级的英国产业革命所留下的深远后果进行了分析。他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中一系列有规律的现象：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工业中失业后备军的形成、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所受到的剥削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而加强。恩格斯清楚而真实地描写了工人的劳动条件——工资、工作日、居住条件和拆散工人家庭的沉重的女工劳动和童工劳动，刻画了失业者的绝望的处境，从而着重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

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状况和产业革命以前劳动群众的状况有什么原则区别，现代雇佣工人和奴隶、农奴有什么不同。他这样说：“奴隶的生存至少会因为他的主人的私利而得到保障；农奴也还有一块用来养

活他的土地；二者都至少还有不致于饿死的保障；而无产者却只有依靠自己，人们还不让他们去应用他们自己的那种可以完全依靠的力量。”

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和其他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区别不仅在于他们的生活极端没有保障，不仅在于他们经常地过了今天愁明天。恩格斯的主要功绩在于他看出了无产阶级是这样一个阶级：他们的生活条件促使他们能够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使他们能够完成自己的伟大的历史使命——消灭资本主义。

恩格斯在他的书里阐述了工人阶级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进行斗争，他们如何从最初对于非人的剥削的自发抗议转到有较高的组织性和觉悟性的斗争。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即把社会主义和宪章主义结合起来是英国无产阶级的主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任务。他证明：工人的群众性政治革命运动应当把他们引向社会主义。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要从空想主义者个人的幻想变为现实的力量，就必须成为工人阶级群众性政治斗争的目标。

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把空想的社会主义变成科学的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从个别软弱无力的人们的幻想变成人数众多的强大的阶级的理论——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就落到卡尔·马克

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肩上了。

1844年8月底，恩格斯离开了曼彻斯特。他在回国途中路过巴黎时去拜访了当时住在那里的卡尔·马克思。巴黎的10天共同生活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终生的结合打下了基础，这是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斗争和友谊的结合，这是一个用革命的理论、战略和策略基础武装了工人阶级的两大天才的结合。

在《德法年鉴》上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恩格斯的这一著作更推动了马克思去研究政治经济学，这种研究是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关于农民状况的一些论文时就已经开始了的。这时，马克思就着手批判地形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首先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同时他还研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和空想社会主义。当恩格斯还在曼彻斯特的时候，就已经和马克思通信了，可惜这些书信并没有保存下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会见的时候，不仅都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并且已经根本改变了自己的哲学观点，从唯心主义走上了唯物主义道路。

德国哲学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转向唯物主义起了巨大的作用。费尔巴哈在他的《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一书中证明，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模样创造了

上帝，在自然界和人之外什么东西也没有。

恩格斯虽然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评价很高，但却又善于批判地对待他的观点，看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全部缺点和局限性、它的消极主观的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超过了费尔巴哈，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解释社会现象和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时，也必须彻底采取唯物主义的观点。

新的革命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合作写成的著作里奠定基础的，他们在巴黎短期见面时已经动手写《神圣的家族》一书，恩格斯只写了几章，这一巨著基本上是由马克思完成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的家族》一书中批判这个唯心主义观点时，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即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不是“英雄”，而是人民群众。他们证明，在历史向前推进时，愈来愈广大的人民群众将成为自觉推动历史发展的人物。列宁在强调这个思想的重要意义时，把它说成是“最深刻、最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之一。《神圣的家族》一书已经表述了差不多已形成的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全世界的历史使命的观点。

恩格斯回到巴门后告诉马克思说，他几年不在乌培河谷，那里已大大地变了样，工业已大有进展，反政府的情绪充满了所有新的居民阶层。“一句话，这

里在为我们的原则建立良好的基础，如果我们能把我们的粗犷而热情的染色工和漂白工吸引到运动中来，那末我们的乌培河谷还要叫你吃惊呢。”

恩格斯回到巴门以后，一面从事《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结局工作，一面进行实际的革命活动。他走遍许多城市，和各地的社会主义者建立联系。他常常在为建立工会来改善工人状况而召集的大会上发表演说。恩格斯在这些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证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着一个少数人发财和大多数人贫困化的过程，现存社会关系的必然后果将是社会革命，结果将产生一个以利益的共同性为基本原则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决不会进行任何侵略性的、掠夺性的战争。可是在自卫战的场合下，这个社会的成员“一定会保卫真正的祖国，真正的家园”，因此，他们“将热情焕发，坚毅勇敢地作战，使受过机械化训练的现代军队也要望风披靡”。

恩格斯兴奋地写信给马克思，告诉他这些大会的情形。信中说他为了共产主义宣传的成就而高兴，也为了能够不再“从事该死的抽象的纸上宣传”而“站在真正的活人面前亲身、直接而公开地向他们宣传”而高兴。

但是由于恩格斯进行共产主义的活动和拒绝“该死的生意经”，他和家庭的关系变得紧张而尖锐起来

了，这种关系把他从共产主义宣传的成就以及和群众直接交往来的兴头冲淡了。

1845年春天恩格斯在父亲的家里再也呆不下去了，于是就离开巴黎到了布鲁塞尔。那时，根据普鲁士政府的要求，马克思被法国政府逐出了巴黎，也搬到了布鲁塞尔。

恩格斯后来在回忆他和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的会见时写道：“当我们在1845年春天在布鲁塞尔重新见面时，马克思已经完成了他的关于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论的轮廓，我们就着手从各方面来详细制定这些新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科学地分析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出发，在《德意志思想体系》中证明资本主义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从理论上论证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德意志思想体系》这本书第一次表述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兴替是有客观规律的、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这个思想。随着生产力的增长，一种社会制度必然会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例如封建主义必然会被资本主义所代替。从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变为另一种社会经济结构，是会在没有人们参预的情况下就可以自动进行的。每一种阶级社会所特有的不可调和的内部矛盾必然表现为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就引导到革命和社会制度的更替。从前的历史理论把历史中的创造作用仅仅归功于杰出人物，马克思和恩格斯

就不是这样，他们证明了：真正的历史的创造者是人民群众，而阶级斗争则是历史的推动力。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着手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时候，他们同许多国家的知识分子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已经有了相当的联系。

当时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派别占着统治地位。1834年，德国流亡者在巴黎组织了“流亡者联盟”。1836年，其中的左翼分子分化出来，组织了以手工业为主要成分的所谓“正义者同盟”。“正义者同盟”和法国革命家布朗基所领导的“四季社”有密切的联系。1839年布朗基分子起义失败后，“正义者同盟”的一些盟员被逮捕并被逐出法国。其中有一人——卡尔·沙佩尔、亨利·鲍威尔和约瑟夫·莫尔是恩格斯1843年在伦敦时就认识的，后来，恩格斯在1845年和马克思在英国作六个星期的旅行时，又和他们恢复了联系。当时，1840年在伦敦组织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领导权已经转入“正义者同盟”的这些盟员手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自己提出了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他们不能忽视当时在德国工人中已经存在着的共产主义运动，虽然这种运动非常不成熟、软弱无力而且有错误。因此，除了在还没有接触到共产主义宣传的工人中进行工作，他们还力图 and “正义者同

盟”的一些组织建立联系，帮助同盟盟员克服空想的观点并掌握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威廉·沃尔弗不久就成了和他们最亲近的人）一起在布鲁塞尔着手建立一个组织中心，这个中心必须和分布在德国、英国、法国、瑞士的德国工人的各种共产主义组织建立联系，同样也必须和其他国家的革命的工人运动建立联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建立的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联络委员会同各国共产主义团体以及革命团体的代表建立了通信联系。

到1846年中，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联络委员会和伦敦的“正义者同盟”及“工人教育协会”、英国的宪章派、巴黎的“正义者同盟”以及在德国的一些共产主义团体都已经建立了联系。

这时，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的问题已经提出来了。但是，布鲁塞尔委员会认为聚集力量的时期还没有结束，召开代表大会还为时过早。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召开这个将奠定工人政党基础的代表大会以前，必须进行巨大的准备工作：不仅应把分散在各地的德国工人的共产主义团体联合起来，不仅应向英法无产阶级的组织建立更密切的联系，而且要做到使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明确化，给在工人共产主义者中还占统治

地位的一切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和观点以决定性的打击。

恩格斯在许多大会上尖锐地批判了蒲鲁东主义，揭穿了他们小资产阶级的反无产阶级反共产主义的性质，并证明共产主义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实现。

1847年6月初，同盟代表大会在伦敦开会了。由于经济困难，马克思没能去参加这次大会；恩格斯代表巴黎各组织，威廉·沃尔弗代表布鲁塞尔派出席了大会。

在大会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根据新章程改组了同盟，这个章程的第一节是由恩格斯执笔的，他这样写：“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的、消灭旧的以阶级敌对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财产的新社会。”

同盟用新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代替了旧的口号“所有的人都是兄弟”。这个表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新口号成了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奴役的斗争中的战斗号召。

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新章程被分发给各个组织讨论，并将和新的共产主义纲领一起提交“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最后批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组织和德意志工人协会的同时，也参加了建立更

广泛的组织——“民主协会”的工作，他们通过它来和布鲁塞尔的民主主义者建立特殊的联系。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认为支持一切进步的民主运动是无产阶级的责任。

1847年10月15日左右，恩格斯被再次派往巴黎。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必须进行巨大的准备工作，因为在这次会议上要讨论纲领。

伦敦委员会把沙佩尔和莫尔所拟定的纲领草案分发给同盟各组织讨论。按照当时在为工人制定各种纲领性的文件时所盛行的习惯，他们把这个纲领——《信念的象征》叫做《问答书》。

提交巴黎各组织讨论的是由莫泽斯·赫斯修改过的草案。但是，恩格斯彻底的批判了这个草案，因此会议在结束时建议由他来起草一个新的草案。

11月20日，恩格斯告诉马克思说，他已拟好了这个纲领的草案，并建议用《共产主义宣言》这个名字来代替《问答书》。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你考虑一下‘问答书’吧，我想最好抛掉问答书的形式，把这东西叫做‘共产主义宣言’。因为其中不能不涉及历史，所以现在的形式是完全不合适的。我将带来我在这里写的一个草案。这个草案是用简单的叙事体写的，但是编排得很糟糕，很匆忙。我开头

写‘什么是共产主义？’，随即转到无产阶级，它产生的历史，它和过去的工人的区别，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对立的发展、危机、后果。顺便也谈到各种次要的东西，最后写共产主义者的党的政策中可以公开的那一部分。”

这样，恩格斯便拟定了《共产主义宣言》的第一个草案，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共产主义原理》。

恩格斯在这一著作中阐明的问题，有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可能在一国内获得胜利的问题。恩格斯根据垄断前的资本主义的条件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一国内获得胜利，它将在一切文明国家同时发生。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847年11月12日在伦敦举行。恩格斯作为巴黎组织的代表，马克思作为布鲁塞尔组织的代表，都出席了大会。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长时间的激烈争论中捍卫了他们的观点，结果就通过了他们所提出的纲领草案。代表大会并委托他们最后制定同盟的纲领。

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自己逗留在伦敦的期间扩大了和各国的工人共产主义者及民主主义者的联系。例如他们出席了国际民主主义者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的宴会。他们在宴会上的演说中指出了无产阶级在

民族问题上的基本政治路线。恩格斯在他的演说中提出了一个原理：“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后来这一原理就成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指导原则。

1847年12月中旬，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伦敦到达布鲁塞尔。恩格斯不久又去巴黎，马克思则忙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的定稿工作。

1848年2月《共产主义宣言》在伦敦出版了。这个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像恩格斯所说的，后来成了“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布最广和最带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起直到加利福尼亚止的世界各国千百万工人的共同纲领”。

《共产主义宣言》的结尾以豪迈的口吻公开号召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革命中只会失去自己的锁链，而他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朽之作，它浸透了高度的创造灵感和强烈的革命热情。“宣言”不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过去一切创造性劳动的总结，而且是科学共产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制定过程中一个新的巨大的进步。

恩格斯不止一次地重复指出，真正科学的革命的

无产阶级理论，这个19世纪最伟大的发现首先是马克思的功劳，因此用马克思的名字来命名是公平的。恩格斯晚年在《费尔巴哈论》中对于马克思在制定科学共产主义中所起的作用和他自己参加这一工作的情况，写过这样一段话：

“我不能否认，在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的40年间以及在这以前，无论在这一理论的创立方面，或特别是在它的完成方面，我都做了一些独立的工作。但是，基本的指导思想的绝大部分，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方面，都是属于马克思的；而且把这些思想最后明确地表述出来，更是马克思的贡献。我所提供的东西，也许除两三个专门领域外，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够轻而易举地补上。至于马克思所做的，我却永远也不能做到。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者。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有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一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公平的”。

### 第三章 在革命浪潮中的恩格斯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阶级斗争下一步的发展所做的估计，是一个有预见性的估计。它异常精确地预示了1848至1849年席卷全欧的革命风暴的进程和特点。

1848年1月，意大利爆发了革命。2月23日至25日，巴黎工人在小资产阶级支持下，在英勇的街垒战中击溃了“银行大王”路易·菲力浦的军队，迫使当时成立的临时政府宣布法兰西为共和国。2月末3月初，革命浪潮波及了与法国接壤的德意志西部和南部诸邦（巴登、维尔腾堡、巴伐利亚、萨克森）。同时在匈牙利也展开了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那时匈牙利是多民族的奥地利这个“各族人民的监狱”的一部分。3月13日，在奥地利的京城维也纳，3月18日在普鲁士的京城柏林，相继爆发了革命。最后，3月——4月，在英国又掀起了宪章运动的新浪潮。这就是在资产阶级历史家称之为“疯狂年代”的1848年最初发生的一些大规模的革命斗争。

在西欧国家中爆发的一系列的革命斗争的当前任务，仍然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某些任务。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革命是历史的伟大动力，是历史的火车头，他们欢欣鼓舞地迎接革命战斗开始的消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认为自己的基本任务是：帮助人民大众，把自觉性和组织性灌输到他们自发的起义中去。

列宁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1848——1849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时期，是他们生平事业的突出的中心点。”

在法国革命的前夜，恩格斯被法国政府逐出巴黎，迁居布鲁塞尔。可是，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只住了一个很短的时期。法国二月革命开始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决定迁到革命斗争的中心——巴黎去。比利时政府加速了这一愿望的实现。3月3日马克思接到由比利时国王签署的命令，限他“24小时内”离开国境；3月4日马克思被捕了，接着他的妻子也被捕了，他们被押送到法国边境之后立即奔赴巴黎。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又停留了两个星期，以便组织一个抗议驱逐马克思的国际运动并为他这个被迫离开布鲁塞尔因而“连最必需的东西都没携带”的朋友料理一下私事。

恩格斯到达巴黎的时候（3月20日），马克思已经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马克思根据“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全权委托，组织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他自己被选为中央委员会的主席，

沙佩尔被选为书记，恩格斯也参加了中央委员会。

1848年德国革命的基本任务是消灭德国在政治上的分散状态和经济上的落后状态。德国当时分成38个大大小小的邦，其中每一个（除四个自由市外）都有自己的王朝、自己的宫廷、自己的军队、自己的一套度量衡等等。除去全国在政治上的分散状态而外，在德国还有贵族地主的统治、自私自利的和保守的官僚的横行霸道、文化方面的停滞状态和愚民政策。在德国还存在着封建关系，阻碍着德国向当时比较先进的资本主义道路发展。

德国的统一可以用两个办法来实现：或者是革命的办法，结果就一定要成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或者是反革命的办法，即全德国围绕着一个强大的邦——普鲁士或奥地利——联合起来。

在这个决定德国今后发展命运的紧要历史关头，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为彻底清除一切中世纪的垃圾和建立统一的民主德国进行了斗争。

3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他们在这个文件中拟定了无产阶级在德国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共产党人在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主要口号，即要求成立统一而不可分的德意志共和国，就是这些“要求”中的首要

之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认为成立统一的共和国是给无产阶级在今后为争取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中减少困难的必要条件。这个文件还提出了下列的极其重要的要求：武装全体人民，无偿地废除一切压在人民头上的封建赋役，没收地主的土地，成立一个国家银行以代替一切私人银行，把矿山、矿井和一切交通运输工具收归国有，实行彻底的政教分立，实行高额的累进税，建立国家工厂。

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所以他们在上面列举的要求中拟定了一系列过渡性的措施，即《共产党宣言》中所谓的“在运动过程中会超出其本身范围”并引起全部生产方式革命的那些措施。

由“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签署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印成了传单，和《共产党宣言》一起作为指示性的政治文件，分发给回国的德国工人。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向“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做了关于在德国建立工人组织的指示。

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也渴望回到革命势力笼罩下的祖国，他们完成了这一切准备工作以后，于4月初离开了巴黎，4月10日到达科伦。

从这时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开始直接参加德国革命的斗争。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回到德国时，城市里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以及乡村里农民的起义已经给了封建专制制度以首次打击，并迫使政府做了让步。可是无论在哪里，人民的胜利果实总是落到了大资产阶级的手里。巴伐利亚、萨克森、维尔腾堡和巴登的政府，都有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代表参加。在奥地利，成立了由“自由主义的”官员组成的政府。在普鲁士，国王授权大资产阶级的首领康普豪森和汉泽曼组织新政府上台执政。

自由资产阶级抓到政权以后，很快地就暴露了自己是反革命的本质，日益明显地转到反革命阵营里去了。它还没有来得及战胜旧的敌人——专制君主、封建土地贵族、官僚，就已经看出了无产阶级是自己的新的敌人。资产阶级害怕的不是当时德国无产阶级的那个样子。而是它即将变成的，也就是法国无产阶级已经变成的那个样子，因此，资产阶级认为和君主、贵族谋求妥协才是自己的出路。

由于资产阶级的叛卖性的政策，没有一个地方的革命获得彻底的胜利。真正的政权——军队、警察、国家机器——仍然操在地主阶级及其君主的手里。决战还在后面。

他们选择科伦作为自己居住的地点不是偶然的。科伦是先进的工业省份莱茵省的省城；那里资产阶级

的政治积极性特别高，群众参加政治生活要比德国其他地方来得早；科伦是德国工人运动最大的中心之一；最后，由于拿破仑法典在科伦还有效，所以那里有比较有利的条件来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计划——出版革命的大型日报。

创办一种群众性的革命机关报，是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拟定的战略和策略计划的最重要的前提。当时的任务是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把这个革命进行到底，同时还要教育和组织群众转向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屡次强调说，解决这一任务的必要条件是要有一个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他们在革命前很久就已经着手组织这样的政党，着手物色和培养党的干部。他们在回到德国以后还是继续执行这条路线，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创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和工人组织。可是在创立全德无产阶级的独立政党的斗争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当时德国无产阶级大部分还不是产业工人，而是手工业工人。他们还很软弱，还没有组织起来，没有壮大起来，充满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在经济上落后和政治上分散的德国，还没有创立一个群众性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几百个分散在全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在突然发动起来的广大人民群众中是显不出什么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和任何宗派主义都不相容的，他们必须考虑到当时德国无产阶级的水平。因此，他们回到德国以后，为了避免向前面跑得太远，避免脱离群众，就决定参加已在德国展开的民主运动，站在这个运动的左翼，即先进的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一翼。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所办的报纸的旗帜只能是民主主义的旗帜，不过它在任何地方、在任何一个场合都显示出它特殊的无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

1848年5月31日，《新莱茵报》出版了。这个报纸是优秀的，它团结了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它保证了1848——1849年间阶级斗争最错综复杂变化无常的情况下的正确方向，在这一大批有才华的撰稿人中，恩格斯是首屈一指的。《新莱茵报》上刊载的许多主要的政治论文，大部分是恩格斯写的。因为恩格斯下笔又快又不费力，而且非常善于把文章写得通俗易懂，所以他是《新莱茵报》不可缺少的人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办《新莱茵报》时也像在其他方面一样，相互取长补短，配合得很好。

马克思热烈地赞扬恩格斯道：“他真是一部百科全书。白天也好，夜里也好，吃饱了也好，空着肚子也好，随便什么时候他都能工作，文章写得飞快，机灵得像个鬼。”

恩格斯以最愉快的心情和革命者的满腔热忱埋头

于办报工作。恩格斯后来回忆道：“那是革命的时期。在那样的时候从事办日报的工作是一件快事。你会亲眼看到每一个字的作用，看到文章真像榴弹一样地打击敌人，看到打出去的炮弹怎样爆炸。这些榴弹是以精确的眼力、高明的手法放射出去的，都准确命中了目标……”

马克思和恩格斯极其巧妙地运用冷嘲热讽的武器来挖苦在德国举行的那些代表会议，这些会议以议会的空谈和毫无用处的懦怯的决议来偷换革命的行动，偷换对反动势力的实际斗争。讽刺的锋芒特别指向全德国民会议这个有名的“法兰克福清谈馆”、“老太婆会议”（恩格斯）。在反动政府“把刺刀提到日程上”的时候，这个会议还在漫无止境地辩论如何拟定最好的议程和制定最好的宪法。

恩格斯在他的一系列的论文中间阐明了无产阶级民族政策的基本原理及其在1848年——1849年革命条件下的具体的形式。恩格斯分析了在德国压迫下的人数众多的匈牙利人、意大利人以及各种斯拉夫夫人所进行的民族斗争的性质、阶级内容和动力。

恩格斯以革命家的全部力量和热情来痛斥德国人民的“可耻的过去”，他们几百年来一直是统治者手中的民族压迫的工具。恩格斯揭露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叛卖行为：它继续对其他民族实行以前的压迫政策。

恩格斯着重指出：从革命的利益着想，解放被压迫民族是必要的，解放被压迫民族是对封建制度的打击，是吸引被压迫民族参加革命斗争的强有力的手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彻底消灭民族压迫不仅是德国人民为自己可耻的过去赎罪的方法，而且也是保证他们将来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民族的必要条件。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民族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独自存在的问题，而是整个革命发展问题的组成部分。因此，他们对于各个民族的民族运动做了不同的估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1849 年的具体情况下坚决支持波兰人和匈牙利人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也欢迎起来反对奥地利压迫的捷克人所举行的布拉格起义。

实际上代替了从前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新莱茵报》编辑部，还通过报纸指导了盟员的活动。这些盟员当时分散在全国各地，领导着许多在德国组织起来的工人联合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无产阶级群众生死与共，把他们团结在《新莱茵报》的周围，从革命一开始就进行着反对工人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不管这些机会主义分子披着“右”的还是“左”的外衣。

巴黎无产阶级在 1848 年 6 月的日子里的惨败

是反革命在全欧举行进攻的信号。在这些日子里，巴黎发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首次的公开的内战”。6月23日，巴黎无产者举行了武装起义。这个起义经过四天英勇的街垒战，被血腥地镇压下去了。

对于巴黎起义，恩格斯写了好几篇文章。这是他关于军事问题的最初几篇论文，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很快获得了光辉成就，恩格斯研究军事问题是从武装起义问题着手的，这一点与众不同。

恩格斯在他的文章中赞扬起义者的英勇精神，仓促应变的组织和团结一致。他批判地分析了工人的军事行动计划，从军事观点一步步地研究了武装斗争的进程。

恩格斯从军事观点给巴黎的战斗下结论的时候，认为工人在城市和军队进行武装斗争成功的可能性很大：“既然4万巴黎工人和比他们多3倍的兵力战斗时能显出这样强大的力量，那么，要是全体巴黎工人同心协力地一致行动起来，该有什么样的成就啊！”

随着巴黎无产阶级的失败，全欧洲的反革命抬头了。

反革命的进攻激起了莱茵省人民群众强烈的愤怒。恩格斯立即组织群众对越发无耻的反革命进行斗争。

9月13日，恩格斯在《新莱茵报》召开的科伦群众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大会根据恩格斯的提议，一致通

过致柏林国民会议书，要求它不要屈服于政府策划的以武力解散会议的行动，要求它组织武装抵抗。就在这个群众大会上恩格斯支持了威·沃尔弗关于在科伦成立“安全委员会”的提议。马克思和恩格斯被选进了这个必然要成为人民群众革命机关的委员会。

过了四天，在9月17日，《新莱茵报》编辑部和科伦工人联合会所召开的又一次数千人的工人农民大会在莱茵河畔沃林根村附近的草地上开会了，科伦的许多居民和附近城市的许多代表团都坐着红旗招展的小船赶来参加。恩格斯被选为大会书记。大会根据他的提议，同意了9月13日科伦大会通过的致柏林国民会议书，并宣布承认科伦安全委员会。根据恩格斯的提议，大会还通过了致法兰克福国民会议书，号召它，如果和普鲁士发生冲突，要不惜一切力量捍卫德国人民的民族利益。恩格斯在这个大会上的发言中提出了为建立“民主社会的红色共和国”而斗争的口号，这个口号也列入了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中。

正如《新莱茵报》所预见到的一样，法兰克福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了。报纸在评论起义的结局时写道：“在最近的五个月中，世界上难道还有哪个革命中心的街垒上不曾飘扬过作为欧洲无产阶级兄弟般团结起来的战斗信号的红旗吗？”

“在法兰克福，反对由地主和资本家勾结而成的

议会的斗争也是在红旗下进行的……

“和没有组织、装备很坏的人民相敌对的是社会上所有其余的阶级，这些阶级都组织得很好，装备得很好。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到此时为止人民还是挨打。”

可是群众还远没有偃旗息鼓。《新莱茵报》提醒大家：1848年春天爆发的农民战争还没有达到目的，同时号召农民为摆脱封建制度而斗争。

莱茵省群众运动的蓬勃高涨使政府非常不安，因为《新莱茵报》就是在莱茵省的省城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总部也设在那里。政府把大批军队调到莱茵省，伺机向群众挑衅并组织血腥的屠杀。《新莱茵报》坚决阻止群众进行为时过早的、没有准备的起义。9月25日，政府蓄意挑衅，逮捕了科伦工人运动的著名的活动家沙佩尔和贝克尔。工人联合会中最受爱戴的领袖之一约瑟夫·莫尔也有被捕的危险。工人们决心不让莫尔被捕，他们一听到普鲁士军队开来，就赶紧构筑街垒。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费了好大的劲才劝阻住群众举行过早的发动。报纸写道：“在没有一个重大的问题推动全体人民起来斗争，因而任何起义都必然遭到失败的时候举行起义是荒唐的，何况最近几天可能发生重大的事件，从而举行起义就有恰好在决定关头的前夜丧失战斗力的危险，因此就更加荒唐了。”

政府挑衅未成，就在9月26日宣布科伦处于戒严状态，解除市民自卫军的武装，封闭工人组织和民主组织，也封闭了一些报纸。《新莱茵报》当然也被封闭了。同时政府还下令逮捕报纸的几个编辑，其中也有恩格斯，他在莱茵省九月群众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间，是特别活跃的人物。

恩格斯和报纸的其他三个编辑——德朗克、斐迪南·沃尔弗和威廉·沃尔弗，不愿意落到普鲁士军阀的手里，不愿意当革命正在高潮的时候被关进监狱，于是就逃出了科伦。恩格斯在逃往国外的路上遇到了他的父母，他和他们起了很大的冲突。恩格斯当时的革命活动把他父亲气得发狂，所以他们的冲突是没有什么奇怪的。恩格斯和德朗克一起从德国逃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当地警察一得到消息立刻就把恩格斯逮捕，关进了监狱，后来把他“当做流浪汉”用囚车押送到法国边界。10月12日他到达巴黎。

巴黎这个反革命获得了胜利的城市给恩格斯留下了沉痛的印象。

恩格斯把1848年2月以后“暂时陶醉于共和国的蜜月中”的巴黎和1848年10月的巴黎相比，他在自己日记中写道：“从那时到现在，巴黎经历了5月15日、6月25日世界上未曾有过的最残酷的斗争，曾经血流成海，有15万人死在那里。卡芬雅

克的榴弹炸毁了巴黎人的抑制不住的欢笑，压下了马赛曲的歌声……工人没有面包，没有武器，痛恨得咬牙切齿。可是巴黎已经死了，这已经不是巴黎了……”

恩格斯在日记中写道：“我不能在这个已死的巴黎长久地呆下去。我必须走，不管到哪里都行。于是我首先上瑞士去。因为我的钱不多，只好徒步走……”

恩格斯费了两个星期才从巴黎经过法国南部步行到瑞士，他先到日内瓦，后来又到达洛桑。他在收到了马克思给他的钱以后，又从洛桑到了伯尔尼，并且在那里暂时住下来。

被迫居住在偏僻的、充满小市民气息的、远离革命风暴的瑞士，对于具有战斗性格的、渴望直接参加革命斗争的恩格斯说来，是完全不能忍受的。可是马克思阻止恩格斯回德国去。恩格斯问马克思道：“这是怎样一回事，难道我还不能回国？”他雪片似地写信给马克思，信里充满了焦急的情绪。1849年1月8日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我老是想很快就能回国。在国外闲坐无事，什么有计划的工作都不能进行，完全置身于运动之外，真是令人厌烦到极点了。我很快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在科伦坐牢，也比生活在自由的瑞士好。”

可是，恩格斯住在国外，实际上决不是像他自己因渴望回到斗争的中心而说的那样“闲坐无事”。他

参加了瑞士的工人运动。1848年12月他以洛桑工人联合会代表的资格出席了在伯尔尼召开的工人大会，洛桑工人联合会是把他当做“无产阶级的老战士”而加以委任的。恩格斯在伯尔尼给《新莱茵报》写了几篇文章，其中包括《匈牙利的革命斗争》。在这篇文章里，恩格斯热情地赞扬起义的匈牙利人在和反革命作斗争中所采取的革命手段。恩格斯写道：“一个被优势的反革命所包围的民族，敢于以革命的怒火和懦怯的反革命的疯狂相对抗，敢于以红色和白色恐怖相对抗，这在1848年革命运动中还是第一次，也是1793年以后的第一次。”

到了1849年的1月中旬，恩格斯才终于有了回到德国的可能。

当恩格斯到达科伦的时候，革命正处在艰难的日子里。反革命展开了全线进攻。革命的维也纳经过工人的英勇保卫战以后，已经在1848年10月31日陷落了。

1849年2月7日，恩格斯和马克思被控“侮辱当局”，不得不一起出席陪审法庭受审。在法庭上，被告反而成了原告。恩格斯在法庭上的讲话中，出色地证明了他和另外几个被告所写的那几篇引起指控的文章完全与事实相符，是预见性的文章。陪审法庭不敢判决他们有罪，于是就把他们释放了。

1849年春，德国的情况特别尖锐和紧张起来了。反革命正在聚集力量，想进行最后一次打击。两个正在动员自己力量的敌对营垒——革命营垒和反革命营垒——之间的决战迫近了。

5月初，德国西部和南部——萨克森、威斯特伐里亚、普法尔茨和巴登——都卷入小资产阶级所领导的起义的火焰中。

虽然法兰克福议会的帝国宪法是起义的导火线，但这个议会却很快就退出了斗争的舞台。议员们对革命活动照例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关于他们，恩格斯写道：“他们空谈、抗议、哀号，但是既没有勇气，也没有智慧来行动。”结果，“对这个受人轻视的会议的最后一点尊敬也消失了。曾经起来保卫过这个会议的起义者对它也不再关心了，当它终于寿终正寝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到它的可耻的消失”。

马克思和恩格斯竭力帮助起义的群众，使运动具有自觉的目的，协助斗争的组织工作。

制定卓越的武装起义计划的历史功绩是属于恩格斯的，这个计划是马克思主义把武装起义看做一种艺术的第一个具体的榜样。

恩格斯认为对于发展中的起义的第一个阶段来说，最重要的是巴登区，那里已经建立了临时革命政府。这个政府得到绝大部分居民群众的拥护，拥有已经转

到人民方面来的军队，储备有足够的军需和武器。巴登周围的地区，不是已经起义了的（如普法尔茨莱茵省），就是即将起义的（如维尔腾堡、黑森、拿骚、法兰克尼亚）。恩格斯在他的计划中指出，必须一分钟也不迟延地立刻使起义越过巴登的界线，扩展到黑森——达姆斯塔德、法兰克福、拿骚和维尔腾堡。必须立刻从现有的常备军队中调集8000到1万人，把他们派往法兰克福，使起义人民和起义军队的声威能够震撼全德国民会议。

这样，恩格斯就巧妙地确定了从起义的巴登给北部、给法兰克福以主要打击的唯一切实可行的方针。夺取法兰克福会使起义具有全德的性质（全德国民会议设在法兰克福），从而在精神和政治上具有极大的意义。此外，夺取法兰克福也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这会把莱茵河战线交给起义者并建立起根据地，以便革命力量进一步向西北部推进，靠拢莱茵普鲁士的起义区。

恩格斯认为，从内部巩固起义的力量并把这些力量组织起来是这些大胆的军事行动获得最后胜利的必要条件。“必须把起义的力量集中起来，供给起义者必需的经费，并立刻取消所有封建贡赋以促使占人口中大多数的农民关心运动。建立一个军事机构和财政气的总的中央政权，取消巴登和革命军占领的一切地

区的所有封建贡赋，这就足以使运动更加饱满有力。

“但是，这一切必须一开头就做到，要迅速，只有迅速才能保证成功。”

依靠最大限度地发挥群众的革命毅力、果断而集中地领导起义、大胆和迅速地行动，这就是恩格斯武装起义计划最重要的特点。

恩格斯所特别注意的第二个大起义区是拥有大批产业工人的莱茵省，《新莱茵报》这个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司令部就在这个区域的中心。但是，恩格斯冷静地估计了政治情况和军事战略情况，认为只有特别有利的条件才能使莱茵普鲁士变成起义的强有力的因素。问题在于这个区域为七个要塞所环绕，驻有几乎三分之一的普鲁士军队，又满布着纵横交叉的铁路等等。在这种条件下需要外来的坚毅的革命行动，需要其他起义地区的积极援助，只有这种援助才能够突破反革命势力集结于莱茵河畔的军事力量，打乱他们的军事指挥，使士兵群众的革命情绪更加高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依靠产业工人群众的莱茵省的起义才能成为全德革命的强有力的因素，成为能使起义扩大和深化并把整个运动引到更高阶段去的力量。恩格斯把这个远景和欧洲的革命斗争的总的远景，和法国及意大利的革命的新高涨、和匈牙利的革命战争联系起来。恩格斯的1849年春季武装斗争的整个计划

是一个大无畏的计划，可是它是建筑在对斗争的政治、战略和军事技术条件的冷静估计之上的。

5月9日 - 10日，武装起义在莱茵省的贝尔格 - 马尔克工业区爆发了，起义同时还席卷了爱北斐特、佐林根、哈根和伊塞隆这些中心城市。

恩格斯接到起义的消息后，立刻拟定援助右岸起义地区的计划。恩格斯这样阐明这个计划的实质：

“首先，在要塞和有驻军的城市中应该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爆发；在莱茵河左岸，必须在小城市、要塞、工厂区和农业区进行破坏活动，以便把莱茵河的驻军牵制在当地；

“最后，必须把多余的力量全部投到莱茵河右岸的起义地区去，扩大起义并力求……在那里组织革命军的核心。”

恩格斯把这个计划告诉了朋友和战友之后，就放下笔杆拿起了枪杆，于5月10日出发到故乡乌培河谷，到爱北斐特去，如他自己所说的，去“执行计划的第三条”。

恩格斯到了爱北斐特后，发现那里的情况很不好：极端混乱、毫无秩序、人心惶惶，而领导运动的小资产阶级的“安全委员会”甚至连一点最起码的坚决措施也没有采取。但是，恩格斯在这里找到了几百个武装工人，其中有400多人是特别以具有组织性和坚

决性著称的佐林根的无产者。恩格斯依靠优秀的工人，展开了炽烈的战斗活动。“安全委员会”委托恩格斯监督构筑街垒，他就迅速建立了一个特种工兵连，筑好了街垒，改建了一部分已经筑成的街垒，在街垒中布置了人员、大炮等等。

恩格斯采取了一切办法使“安全委员会”实行坚定彻底的路线。他要求立刻解除爱北斐特自卫团的武装，这个组织自称“中立”，而实际上是大资产阶级的反对工人的组织。恩格斯建议依靠佐林根工人队的帮助“立刻”解除自卫团的武装。他主张把从自卫团那里夺来的武器分发给工人，并主张实行强制税来供给武装工人。恩格斯的下一步计划规定了把起义扩展到邻区并有计划地组织贝尔格 - 马尔克全区的防卫。

为了在当时那个阶段保持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统一战线，恩格斯没有提出任何特殊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要求。恩格斯的行动计划是一个对反革命进行坚决而彻底民主的革命斗争的计划。

但恩格斯是“红党”的领袖之一，是使资产者和胆小如鼠的市侩胆颤心惊的《新莱茵报》的编辑之一，光是他来到了爱北斐特这一事实就已经把那里的资产阶级吓坏了。恩格斯的坚毅活动、他的计划和要求使资产阶级陷入了疯狂的状态。资产者竭力用恩格斯在力图“实行”“恐怖统治”这种恐吓以及各式各样的

诽谤和诬蔑来唆使居民中的小市民阶层反对恩格斯。“安全委员会”在资产阶级压力下打算考虑逮捕恩格斯，可是因为惧怕武装工人，所以决定只把他驱逐出这个城市。后来，恩格斯以感激的心情回忆佐林根的工人时说道：“要是没有佐林根人，这些资产者就会把我关进监狱，在那里我很可能成为他们用来向普鲁士老爷们赎罪的牺牲品。”

5月14日晨，恩格斯接到了“安全委员会”的书面通知：“爱北斐特的资产阶级对他的到来感到极端恐惧；他们时刻担心着恩格斯会宣布成立红色共和国，因此希望他离开。”同一天晚上，“安全委员会”通过了把恩格斯从爱北斐特赶走的决议，理由是：“他的到来可能引起对运动性质的误解。”5月15日晨，居民得到了关于这件事的通知。赶走恩格斯命令在工人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怒和骚动，他们要求恩格斯留下来，保证用自己的生命做代价来保护他。但是，恩格斯冷静地估计了一下情况，知道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公开冲突的时间还没有来到。因此，他就到工人那里去，叫他们放心，然后，他把职责交给自己的副官，离开了爱北斐特。

在“安全委员会”的小资产阶级老爷们干出叛卖行为以后，恩格斯回到了科伦。

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

墨出了最后一号。

编辑部的告别书《致科伦工人》是用下面的话作为结束的：“在和你们告别的时候，我们《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对你们的关怀表示感谢。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我们的最后一句话将永远是：解放工人阶级！”

35年以后，当恩格斯回想起《新莱茵报》的结局时，他能够以应有的骄傲的心情说：“当时我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堡垒，但我们是奏着乐，高举着迎风飘扬的旗帜——用红颜色印的最后一号报纸，携带着武器和装备离开的。”

《新莱茵报》被封闭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到了起义中的德国西南部。他们为了扩大起义并使起义更为深入，为了促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实行坚决的革命路线，竭尽了一切的努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曼海姆(巴登)会晤了巴登运动领导者，他们力图说服这些领导者来实行恩格斯的上述计划。但是，巴登的领袖们“既没有勇气和毅力，也没有才智和主动精神”(恩格斯)，对他们的忠告置若罔闻。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巴登转到第二个起义中心——普法尔茨，会晤了普法尔茨临时政府的委员们。在返回巴登的途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被黑森的士兵逮捕了。他们被控参加了起义，并被押送到法兰克福。但是在那里他们获得了释放。

马克思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在德国获得任何重大的成绩，相反地，他却期待着在法国爆发大的革命事变，于是就受中央民主委员会的委派，到巴黎去了。而恩格斯却到了凯则尔斯劳顿，打算“占据《新莱茵报》在这个运动中所能占据的那个唯一岗位：士兵的岗位”（恩格斯）。

恩格斯期坚决地谢绝了无数次要他去担任这些或那些民事和军事职务的邀请，因为他不愿意替小资产阶级领导担当无穷尽的错误和失策的责任，而经验证明，要纠正小资产阶级领导路线中的错误是不可能的。但是战斗的革命气概使恩格斯决不会终日闲坐，无所事事。恰巧在这个时候，以共产主义者维利希为首的志愿部队胜利地包围了普鲁士的兰都要塞。假如维利希有炮队，那就可以很容易地把这个要塞攻下。恩格斯天天向凯则尔斯劳顿总参谋部坚决要求把曲身炮调到维利希那里去，但毫无结果。由于恩格斯一再过问这类事情，由于他老是公开尖锐地批评地方当局的不坚决和不能令人满意的行为，他终于在普法尔茨边界的一个小城市里被捕。他双手被绑，从那里被徒步押送到凯则尔斯劳顿，关进了监狱。恩格斯的被捕在参加普法尔茨运动的先进分子中间，特别是在莱茵—黑森志愿军团的莱茵工人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怒。他们表示，如果不释放恩格斯，他们就退出军团。结果，恩格斯

坐了 24 小时的监牢，临时政府就命令把他释放并一再地向他表示歉意。

以后不久就传来了反革命的普鲁士军队进攻的消息，这迫使恩格斯拿起武器，动身到维利希军团去。

恩格斯光荣地完成了他那作为起义军中一个士兵的使命。后来他骄傲地写道，在普法尔茨—巴登部队中“最彻底的共产主义者也就是最勇敢的战士”。这样的人首先要推恩格斯本人。

6 月 19 日，他到了维利希大本营所在的欧芬巴赫并当了维利希的副官。从这时候起，一直到 7 月中旬普法尔茨—巴登部队被扣留于瑞士止，恩格斯参加了维利希志愿军团的进军和战斗。这个军团成为最优秀的起义部队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在它的队伍中有许多工人，他们显示出自己是有最良好的纪律的战士。这个军团承担了既困难又危险的任务，他们要经受进攻的普鲁士人的打击，掩护巴登部队撤退。

恩格斯很快就显示出自己是一位卓越的组织家，他不怕任何工作和任何危险。那里，队伍中连最必要的装备和弹药都非常缺乏，而恩格斯坚毅地担负起搜罗和供应火药、铅、子弹、武器、服装、粮食的任务。恩格斯也是那些坚毅地对战士进行军事训练的人中的一个。在军事冲突的日子里，恩格斯始终出现在最前线，他参加过四次战斗。关于恩格斯，爱琳娜·马克

思写道：“所有那些在战火下看见过他的人，很久以后都还在谈论他那非凡的镇静和绝对漠视任何危险的精神。”

从6月1日起(那时马克思离开德国到了巴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相当长的时间(两个多月)中彼此完全失掉了联系。马克思非常为恩格斯担心，因为他知道恩格斯力求留在最危险的地方。而恩格斯也同样为自己的朋友担心。恩格斯在他能够从瑞士寄给马克思夫人的第一封信(1849年7月25日)中深为担心地写道：“只要我可以相信马克思是自由的就好了！”

1849年11月恩格斯到达伦敦，恩格斯的勤勉的性格和永无止境的求知使他在海上旅行时也不肯闲着，他研究了航海学。在保存下来的恩格斯的那次旅行的日记中，就有关于太阳的位置、风向、海和海岸轮廓的情况等变化的记录和标记。

恩格斯到伦敦以后，就和马克思重新开始了共同的革命工作。当时的环境是极端困难的。反动势力到处都取得胜利。在最不坚定的那部分政治流亡者当中，颓丧、惶惑和对自己的事业失去信心的情绪开始弥漫起来，这是毫不足怪的。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示出他们是革命无产阶级的胜任的领袖。他们所具有的钢铁般的毅力、坚强的性格和由于有科学依据深信自己事业的正义性而产生的百折不挠的乐观精

神，现在特别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1849年9月，同盟的中央委员会重新组织起来了。恩格斯在迁居伦敦以后也参加了中央委员会。在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老盟员几乎全都聚集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周围。除了他们之外，又出现了新的力量：其中突出的人物有维利希（恩格斯曾和他一起在巴登—普法尔茨战役中战斗过）、康拉德·施拉姆和威廉·李卜克内西。

要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不克服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他们大批地聚集在伦敦，进行着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斗争，企图把革命的流亡者从组织上联合起来并置于自己的领导下。恩格斯和马克思一道起来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联合革命流亡者的企图进行斗争，坚持成立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特殊的独立的组织。

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建立和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紧张工作很快地产生了效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于1850年6月所起草的第二篇《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已经能够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宣布同盟获得了重大的成就。马克思和恩格斯一面为在德国建立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一面把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优秀的革命分子团结到自己的周围。第二篇《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

指出，中央委员会通过几个特派的盟员也和法国人、英国人、匈牙利人的真正的革命政党建立了联系。

恩格斯非常积极地参加了团结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工作。他不止一次地在伦敦举行的各次国际性大会上发言。恩格斯和革命的宪章派的联系特别密切。他还在1842—1843年间就在他们的行列中和他们一起进行过斗争。

恩格斯非常注意农民问题。在《政治经济评论》杂志最后一期(第5—6期合刊，1850年11月底出版)里，刊载了恩格斯的伟大历史著作《德国农民战争》。

恩格斯在这一杰作中，根据唯物史观分析了德国农民战争——1525年的伟大的反封建的农民起义——的原因、进程和结果。虽然恩格斯在这里论述的是历史上很远的事，但这一著作一点也不远离现代政治斗争风暴的“学究式”的研究。恩格斯是要藉这个著作特别着重指出农民在阶级斗争的具体作用和意义，指出革命的无产阶级必须争取领导农民群众。恩格斯还根据1525年阶级斗争的具体历史材料，向群众阐明了从1848—1849年革命战争中得出的教训。恩格斯证明，促使农民起义遭到失败的原因是市民阶级——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身——的叛卖行为，以及政治上的分散状态和地方的各自为政。由于这种政

治分散性和地方独立性，在德国发生的不是全民性的运动，而是数以百计的地方起义，这些起义都分别被镇压下去了。恩格斯在他的著作里还介绍了“伟大农民战争中的坚强人物”，并要德国人民不要忘记他们的革命传统。恩格斯写道：“曾经有这么一个时期，德国出了能和其他国家的优秀的革命家并驾齐驱的人物；德国人民表现了那样坚韧不拔的精神，发挥了那样大的力量。这种精神和力量，如果是在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里，一定会产生最光辉的结果；德国农民和平民想出了常常足以使他们的后人惊心动魄的主意和计划。”

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也是为总结1848—1849年的革命战斗而写的。恩格斯精通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他所亲自参加的事变知道得非常清楚，了解得非常透澈。这一切就使他当时能够根据1848—1849年的德国革命刚刚留下的痕迹，给这次革命的前提、动力、主要阶段、当时的国际局势以及从革命得出的教训和结论做出经典式的分析。

武装起义的问题，在恩格斯的这本著作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恩格斯从1848—1849年武装斗争的经验中所吸取并且在他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中总结出来的教训，永远成了科学的无产阶级战

略和策略宝库中的一部分。

恩格斯在这本书中典范地表述了武装起义是一种艺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异常精确地指出了无产阶级在起义中为了取得胜利所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则”。他这样写道：“起义，如同战争或其他事情一样，也是一种艺术，它得遵守一定的规则。忽视这些规则的政党必然会归于灭亡……首先，在没有做好准备来面对面地迎接起义的一切后果时，无论何时都不要把起义当做儿戏……其次，既然起义已经开始，应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转入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当他和敌人较量以前就已输定了。必须在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使是不大的胜利也好；必须保持由于起义者初次的胜利进展所造成的精神优势；必须把那些总是跟着较强的人走的和总是站到较可靠的一方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必须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军队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却。”

“在举行起义以前，必须冷静地估计政治的和军事的态势。可是一旦决定起义并开始准备行动，就必须把起义当做艺术来对待，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极度的勇敢行动起来，就必须不断地猛烈进攻。”

“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850年9月分裂以后，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除了维利希、沙佩尔和

他们的追随者所进行的瓦解活动，还加上了警察的迫害。1851年5月，在德国有许多杰出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工作人员被捕了。政府靠着手下的警探特务，开始准备对被捕的共产主义者进行阴险的审讯。

恩格斯对马克思为对付正在准备中的审判而展开的紧张的热烈的的工作给了巨大的帮助。他们在英国和德国的许多报纸上，揭露了普鲁士警探施梯伯所进行的挑衅、捏造以及诸如此类的阴谋，同时收集了被告辩护的材料和文件。

1852年5—6月间恩格斯到曼彻斯特去找他的马克思合写了一本名叫《流亡中的伟大人物们》的小册子。他们在这本小册子里把伦敦政治流亡者的小资产阶级领袖们刻画得淋漓尽致。这些人不进行真正的革命工作，反而像老鼠一样可怜地吱吱乱叫。

1852年10月，11个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在科伦受审，其中7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为了揭露普鲁士政府和科伦给共产主义者判罪时所用的那些卑鄙手段，马克思写了《共产主义者在科伦受审的真相》这本小册子，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了《共产主义者在科伦的受审》。

德国共产主义者的被捕和随后举行的科伦审判，给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以致命的打击。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领导的伦敦小组和大陆的联系被切断了。同盟实际

上已不存在了。1852年11月中旬，共产主义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宣布解散。

虽然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反动势力的包围下，在政府的迫害下被迫结束，但它在工人运动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它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雏形，是以不朽的《共产党宣言》为纲领的组织。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培训出来的德国无产阶级的优秀的代表，在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以后，仍旧继续进行自己的党的工作，宣传革命理论、教育工人群众并训练他们以迎接新革命战斗。

由于反动势力的进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活动和政治活动就处于非常艰苦的条件中。驱逐出境、贫穷和物质上的困苦等一切灾祸都降到了他们的头上。资产阶级的社会现在向无产阶级的领袖进行报复，剥夺了他们最起码的生活条件。恩格斯靠新闻工作还能够勉强地维持自己的生活，但是这对家庭负担过重的马克思来说是不堪设想的。

为了使马克思的天才得以发挥，为了把马克思从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报复下拯救出来，为了替无产阶级保全自己的领袖，恩格斯在这些条件下忍受了一切牺牲。

在当时的条件下，恩格斯能帮助他的朋友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到营业所，回到“该死的生意经”中去。

恩格斯毫无怨言、毫不勉强地这样做了，因为其他的出路是没有的。马克思也同样坦率地接受了他的朋友的这种无限的自我牺牲的表示。事实上，他们仍然是为了他们终生献身的那个事业的胜利而肩并肩地进行着战斗。新的条件只是使他们之间的分工改变了形式。恩格斯一贯承认和佩服他的朋友的超群天才，为了使马克思能够继续他的理论工作和政治工作，他认为由他来负担他这位朋友及其家庭的大部分开支是完全应该的。

恩格斯决定重新回到营业所以后，就在1850年11月迁往曼彻斯特，在“欧门—恩格斯”公司做办事员。

恩格斯回到营业所，马克思则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加紧从事研究工作，这就引起了那些继续玩弄“欧洲委员会”、“临时政府”的把戏并为立刻实行革命而在美国发行“革命公债”等等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一连串的造谣和诬蔑。例如我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里知道，流亡者兄弟会会友卢格、维利希等人用最粗暴的方式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什么他们“孤立了，被大家抛弃了”，并且念念不忘地责备恩格斯做“生意”。但是，恩格斯意识到他是在履行自己的义务，所以他不在乎这些讽刺，并安慰在这种情况下被激怒的和准备立即投入战斗的马克思，叫他

不要理睬流亡者的“专事毁谤和卑鄙勾当的学派”，蔑视这些抨击，因为“谢天谢地，我们忍受过的还不仅是这些攻击”。恩格斯认为，只要他能帮助马克思安心写作《资本论》，他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贡献就比所有那些空谈革命的小资产阶级英雄加在一起还要大得多。

但是，恩格斯还是希望他不会长久地背着“该死的生意经”这个可恨的包袱。他期待工业高涨很快就结束，危机马上爆发，并接着来一个新的革命风暴。

这个古怪的“商人”的信在某种程度上是出奇的，这些信充满了对新危机、对大规模的工业破产的热望。交易所中的价格愈下降，企业家们的情绪愈低落，这位曾经被燕妮·马克思在一次开玩笑时称为“棉纺织业巨头”的恩格斯就愈高兴。

当1857年工业危机开始时，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到他在这一总崩溃的情况下感到非常舒服：“危机像海水浴一样对我的身体有益，这点我现在已感觉到了。”

恩格斯希望新的革命高涨将随着危机到来，但是这个希望并没有实现。因此，他的“埃及的幽囚”拖延了几乎20年之久。恩格斯起初进公司时是一名办事员，1860年起成为公司的代理人，1864年起成为公司的股东。

由于工作条件，恩格斯不得不和那些和他格格不入的人相周旋，遵守外表上的礼节，这样过着两重生活。只有在自己的妻子玛丽·白恩士(一个普通的爱尔兰女工，恩格斯第一次居住在曼彻斯特时就爱上了她)身边，他才能离开那些和他格格不入的人而得到休息并和他的曼彻斯特的朋友——共产主义者威廉·沃尔费、赛米尔·穆尔、卡乐·萧莱马以及宪章运动的左派领袖会晤。

玛丽对恩格斯的爱情是忠诚而深挚的，这对恩格斯来说，在那艰难困苦的岁月里，是一种极大的支持和安慰。

1863年1月6日，玛丽因心脏病逝世。由于这一损失，恩格斯忍受了极大的痛苦。他写信给马克思说：“如果一个人和一个女人在一起生活这样久，那她的死是不能不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的。我感到我已经把我最后的一点青春和她埋葬在一起了。”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将近20年间被迫在不同的城市中生活，但是，在这些年代里他们那种史无前例的联盟却更加巩固了。诚然，他们现在常常感到苦闷，他们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欢笑”。马克思不可能常到曼彻斯特，恩格斯也不可能常到伦敦，但是他们之间的通信是很勤的。例如只要恩格斯回信慢了一些，感到不安的马克思马上

就写信问他：“亲爱的恩格斯！你在哭泣还是欢笑，你酣睡了还是醒着？”

正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多少年来彼此隔着相当的距离而不得不主要靠通信来保持联系，所以我们现在拥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量的书信。这是研究他们科学思想的实验室，这是他们遗留下来的全部文献中的奇珍异宝。

科学和政治中的任何一个部门都没有不在这些通信中谈到的。哲学和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历史和语言学、数学和技术、军事和文学等各种问题，在这两位渊博的学者的通信里都讨论到了，而讨论中的一两句话或一点意见有时就是真正科学地、马克思主义地理解一系列错综复杂问题的钥匙。不仅科学，而且工人阶级的政策问题、阶级斗争的即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都有鲜明的反映。最后，通信集还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生活过的那个时代的经济、对外政策和工人运动的最丰富的宝库。列宁在论及这些通信时写道“这些通信的科学的和政治的价值极大。这些通信不仅使读者能很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之处，并且还把马克思主义的最丰富的理论内容发挥得极为详尽，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常在通信中再三反复地说到他们学说的许多方面，强调并说明了

——有时是用共同讨论和互相说服的方式——最新颖（对于先前的观点而言）、最重要和最困难之点……

“如果我们想用一词来表明全部通信集的焦点，即其中所发表所讨论的一切思想集结的中心点，那末这个词就是辩证法。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来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注意的事，这就是他们做了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的地方，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英明地进行的一步。”

不管敌人怎样迫害马克思和恩格斯，不管资产阶级报纸怎样对他们进行造谣和诬蔑，不管他们为了生活而不得不进行怎样繁琐的和折磨人的斗争，但是他们始终都保持着乐观、幽默感，锐气和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

当恩格斯为了整理马克思的遗稿而重读他们 1842—1862 年间的通信时，他写信给贝克尔说：“过去的日子和我们的敌人给予我们的那些愉快的时刻又重新出现在我眼前。当我想起这些旧日的情景时，我常常笑得流下泪来。我们的敌人是永远不能把我们的幽默感夺走的。”

当马克思逝世后有一个文人在自己的文章里大谈“不幸的马克思”时，恩格斯写信给伯恩施坦说：

“等到我的情绪特别愉快的时候，我也许要把他痛骂一顿。如果这些蠢驴有可能把摩尔和我的通信读一遍话，他们简直会惊奇得目瞪口呆。”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有极丰富的材料说明他们是理论家，是无产阶级的领袖，是当代最杰出的人物，他们的贯彻始终的精神、彼此的团结一致和力求达到的坚定性使人深感惊讶。最后，只有他们的通信才使人们能全面地看到无产阶级的天才马克思为了不致于在贫困中死去而不能不进行的艰苦的斗争；只有他们的通信才使我们能全面地看到马克思的最无私最忠诚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形象。

当恩格斯只是公司里的一个普通办事员，所获的报酬还极菲薄的时候，他给马克思的帮助是很不够的，贫困简直把马克思压得透不过气来，使他和他的家庭不得不放弃最迫切需要的东西，不得不和债主进行永无休止的“战争”，不得不逃避房主和店主的纠缠。贫困使马克思的家庭接连遭受牺牲。马克思的聪明伶俐的爱子，全家的宠儿穆希的死，使马克思特别感到悲痛。对于孩子的病，恩格斯也同样感到非常难过，他想尽了一切办法想使这孩子从死神的魔掌中挣脱出来，马克思把他的爱子害病经过告诉恩格斯时写道：“我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对我的友谊，感谢你为我进行的工作，感谢你对这孩子的关心。”

马克思在埋葬了儿子以后写信给恩格斯说：“我已经遭受过许多不幸，但是只有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不幸……”

“这几天来，在我忍受着一切可怕的痛苦的时候，时刻都在支持我的是对你和你的友谊的想念，是对我们两人还能在世间共同做一些有意义的希望。”

恩格斯看到自己无力使马克思的家庭摆脱贫困，感到非常痛苦。因此，当他有可能写作的方法给马克思增加一点物质帮助的时候，他便紧紧地抓住了这个可能性。1851年8月，马克思接到了进步的美国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要求，为该报撰稿的建议，于是他就写信给恩格斯请求帮助：“至于《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事，你现在就得帮助我，因为我正在研究政治经济学，忙得不可开交。你就写一些关于德国的文章，从1848年开始。”于是恩格斯立刻着手工作，开始把文章一篇又一篇地陆续寄给马克思，而马克思则按期把这些文章转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的一系列有名的文章就是这样写成的。直到通信出版以后，人们才知道原来这部著作是恩格斯写的，而不是马克思写的。

恩格斯除了替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许多论文外，还帮助马克思把他自己所写的文章译成英文(马克思当时还没有精通英文，到1853年他才

开始直接用英文写作)。马克思在若干年里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许多论文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恩格斯写的。在这方面他们也是互相分工的；恩格斯写的主要是关于军事问题的论文。

虽然马克思在恩格斯的协助下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许多文章，但他得到的稿费却是非常菲薄的。

《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编辑德纳像一个做生意的资本家那样对待自己的撰稿人，他千方百计地减少马克思的稿酬，最后只给他一半稿费。因此，马克思的物质生活又急剧地恶化起来了。

恩格斯不仅在为报刊撰稿的工作上帮助马克思。马克思在各种不同的理论问题上常请教恩格斯，并经常得到详尽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有时是专门“精心探讨过的”回答。马克思有时把恩格斯的这些见解整个地写在自己的论文里。

恩格斯帮助马克思进行他的理论工作，而另一方面，马克思在百忙之中也积极地帮助恩格斯，在恩格斯感兴趣的一系列的理论问题上向他提出自己的意见。马克思往往整天整天地钻到大英博物馆里为恩格斯寻找他所需要的关于军事、历史、文学、语言学等各种专门问题的材料。

在恩格斯留居曼彻斯特期间所从事的理论工作中，对军事科学的研究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恩格斯在柏

林服役期间就已经对军事发生了兴趣。1848—1849年革命斗争的需要，迫使他认真地研究军事问题，首先是武装起义的问题。在留居曼彻斯特期间，恩格斯已经不是断断续续地研究军事科学，而是有系统地、非常认真地研究这门科学。

恩格斯进行的这些研究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为了帮助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和美国百科全书撰稿。但是促使他顽强地研究军事科学的主要原因是他明确地认识到战争问题即武装斗争问题在将来的革命中将起巨大的作用。

恩格斯怀着巨大的兴趣埋头于军事科学的研究，他甚至把自己的休息时间都用来进行这个工作。他从小喜欢骑马，现在他更认为骑马具有特别的意义了。他骑马跳越障碍的练习常常使马克思担心。马克思写信给他这位朋友说：“可不要做太危险的跳跃，因为不久就会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我们拿头去冒险。”恩格斯在回信中强调说，骑马对他来说是他所有军事科目中的物质基础。接着他又补充说：“但是，请你放心，我的脖子将在另一种场合下折断，而决不会在堕马时折断。”

恩格斯痛恨一切肤浅潦草的态度，他并不是作为一个涉猎者和爱好者来对待军事问题，而是以一个习惯于“周详地”、“细致地”从事既定工作的人的切

实认真的态度去对待军事问题。他一开始就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即掌握考取军官官衔所必须具备的有关各种武器的知识。

早在1851年，恩格斯就已经证实了他居留曼彻斯特几个月时在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中所获得的巨大成就。杰霍夫(维利希的拥护者)在其《未来战争概论》一书中对法国(在法国革命获得胜利的情况下)反对欧洲反动势力联合力量的战争前途的说明是根本错误的。为了反驳这本书，恩格斯写了《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和前提》，可惜这本书没有写完，而且当时也没有出版。恩格斯在这本著作中分析法国、德国和英国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对欧洲反动势力联合力量的可能发生的战争的前途时，顺便阐述了从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战争时开始的军事艺术史，并指出了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和在革命以后军事艺术发展的前途。

恩格斯预见性地描述了新社会将具有的不可摧毁的军事力量，他这样说，那时国民生产将会加强和集中，阶级就会被消灭。由社会主义社会创造出来的庞大的军队将具有“空前惊人的力量；而这样的士兵在执行巡逻勤务时，在散兵线上以及在战场上的战术能动性也同样会达到非常高的程度。战争将一定比现社会所能发生的更为有力，更为巧妙，更为机智。”

最后，社会主义的军队也将要以强大的军事技术装备起来。正如生产力的增长是拿破仑作战方法的前提一样，新的生产力也将是军事上新的成就的前提。

恩格斯认为，在一切胜利的革命进程中，在这一革命还没有建立新纪律和新军队之前旧军队就必然要瓦解。这一意见是非常重要的。他在1851年9月26日给马克思的信里写道：“军队的瓦解和纪律的完全破坏既是迄今发生过的一切胜利革命的条件，又是这些革命的结果，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是谁在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的军队中建立了纪律呢？决不是那些只在革命取得几次胜利后才开始在仓促组成的军队里具有影响和威望的将军们，而是国家权力在国内政策上所实行的恐怖。”

恩格斯所写的有关军事问题的著作和论文是非常多的。例如在1853—1855年，恩格斯就写了许多关于克里木战争(法国、英国和土耳其对俄国的战争)的论文。1855年他在美国报刊上发表了几篇评述欧洲国家的军队的论文。

1857—1858年恩格斯写了关于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和法国为了奴役中国而进行的战争)、关于印度的西拍埃反对英国人的起义(人民的起义)和关于英国入侵波斯的论文。恩格斯写了这些论文，这样他也就参加了马克思在那些年代所进行的

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研究工作。19世纪50年代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印度和中国的论文以及他们对欧洲民族问题的评论，奠定了革命无产阶级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政策的基础。后来，在帝国主义时代，列宁和斯大林又光辉地发展了这个政策。

恩格斯在论述中国和印度发生的事变的文章中，也像在他的绝大部分“军事”论文中一样，远远地超出了纯粹军事分析的界限。尽管恩格斯不得不使他的论文适合《纽约每日论坛报》要求的水平，但是从整个性质和语调中可以看出这些论文不是普通的“军事专家”写的，而是出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手笔。例如恩格斯为印度西拍埃起义所写的论文就不仅巧妙地分析了军事行动的过程，而且也是反对罪恶的英国殖民政策的血淋淋的控诉书。恩格斯对英国统治阶级及其在印度活动的兵大爷们极为憎恨，他愤怒的斥责他们：“成吉思汗和铁木真的卡尔梅克联盟像蝗群一样袭击了许多城市，所到之处，生灵涂炭，但是要 and 现在这文明的基督教徒、豪侠的不列颠士兵的侵略比较起来，对一受害的国家来说，却未必不是一种善行呢。”

恩格斯在出色的《波斯和中国》(1857年)一文中着重指出了中国人民已加强反抗外国入侵，并且欣然指出，人民群众积极地而且狂热地参加了反对外

国侵略者的斗争。恩格斯揭穿了英国报纸关于中国人的“暴行”的假仁假义的叫嚷，他说：“我们最好不要像豪侠的英国报纸那样去宣传什么中国人的可怕暴行，而要承认这是争取自己生存的战斗，这是谋求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

恩格斯把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这个开端看做“旧中国的死亡期”来临的先声，看做“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在作垂死挣扎，同时也是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即将来临的先声。

185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和在伦敦出版的德文报纸《人民报》登载了恩格斯论法国和皮蒙特对奥地利战争的24篇论文。1860年，恩格斯写了许多论述西班牙人在摩洛哥的战争和加里波第在意大利南部的革命进军的论文。1861年，恩格斯协助马克思写了一些关于美国国内战争的论文，这些论文都是专门为维也纳的《新闻报》写的。1860—1861年，恩格斯为英国的一家军事杂志撰稿，就各种军事问题写了论文，1862—1864年，他又为德国的一家军事报纸撰稿。恩格斯发表了一系列关于1866年普奥战争的论文和关于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论文。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为美国百科全书写了约80篇军事论文，其中大部分都是由恩格斯执笔的（如《军队》、《炮兵》、《骑兵》、

《步兵》等长篇论文)。

在阅读恩格斯的军事论文时，他的博学和他对重要材料与具体事实的详尽无遗的了解会使你感到惊讶。恩格斯在发表那些论文时，通常并不署名。读者都以为作者是一个杰出的军事专家，这是毫不可怪的。

马克思对他的朋友的军事知识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他完全信赖“曼彻斯特的军事部”，这个军事部在任何军事问题上会立刻给他指示。

恩格斯是革命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军事专家和军事理论家，他比统治阶级最优秀的军事专家和理论家要高明万倍。他有极其广阔的政治视野和丰富的经济知识，他对国际关系有精辟的理解，而主要的是他巧妙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天才的方法——唯物辩证法。这一切使恩格斯和狭隘的军事学术专家截然不同，他把战争看做决定于社会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全部进程的一种社会现象。

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恩格斯给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和军事的观点下了一个综合性的定义。他在这本书中写道：“没有一件东西像军队和舰队那样取决于经济条件的了，军备、人员、组织、战术和战略首先是由当时所达到的生产水平与交通工具所决定的，在这里，起革命作用的不是天才将领的‘头脑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与活的军队成分的改

变；天才将领的影响，最多只限于使战争的方式适合于新的武器和新的战士而已。”从这一观点出发，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卓越地描绘了军事艺术发展的历史面貌。

恩格斯在这一著作中预言性地指出，1870年普法战争以后开始发展起来的军国主义将使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尖锐到极端，尖锐到极限，从而使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军队转变为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强大因素。他写道：“军队变成了国家的主要目的，变成了目的本身；人民只是为了供养士兵而存在。军国主义统治着欧洲并吞噬着欧洲。但是这种军国主义本身就隐藏着自我毁灭的萌芽。一些国家间的互相竞争，一方面迫使它们每年都在陆军、海军、大炮等等上面花费愈来愈多的钱，从而愈来愈加速了财政的破产；另一方面又迫使他们更严厉地实行全国征兵制，从而终于教会了全体人民使用武器并使他们有可能在一定的时机反对统率他们的军事首长，实现自己的意志。而这一时机，只要人民群众（城乡的工人和农民）一具有自己的意志，就会到来的。在这个阶段上，君王的军队将变成人民的军队，机器将拒绝效劳。军国主义也将由于自身的辩证的发展而毁灭。”

恩格斯的巨大的军事遗产，直到现在还有价值。列宁本人对军事科学非常注意，他不止一次地号召党

向恩格斯学习军事，并指出军事知识军事技术和军事组织的巨大意义，他认为这是“人民群众和人民中各阶级用来解决伟大历史冲突的武器”。

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除了从事军事科学方面的写作，还从事语言的研究，他对语言的兴趣在童年和少年时代就已经发生了。现在他开始对语言学作系统的研究，并且获得了确实惊人的成就。恩格斯研究语言学，不仅是从科学兴趣出发，而且也是从他正在进行和今后需要进行的国际性的实际革命工作的需要出发的。

由于恩格斯已经完善地掌握欧洲的主要语言，精通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他从1852年起又着手有系统的研究俄文和斯拉夫系的其他语言。在恩格斯的文学遗产中保存有他从《叶甫盖尼·奥涅金》中译出的15小节，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恩格斯是非常仔细并以极大的兴趣研究了俄罗斯语言和俄罗斯文学的。

由于克里木战争的爆发，由于恩格斯努力研究东方问题，所以他开始研究波斯文。50年代末恩格斯研究了古日耳曼文。1864年因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而引起的丹麦战争刺激了恩格斯去学习斯堪的那维亚的语言。

在60年代末期，当第一国际里尖锐地提出爱尔兰问题时，恩格斯开始学习赛尔特—爱尔兰文。就在

这些年代里恩格斯对荷兰—弗里支文和苏格兰文也进行了研究。由于领导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产生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需要，恩格斯在晚年研究了这两个国家的语言。

恩格斯是一个真正的通晓多种语言的专家，他能流畅地说和写的语言就有 1 2 种，能阅读的几乎有 2 0 种。

恩格斯对语言学广泛的研究决不限于仅仅掌握某种语言的“技术”。对恩格斯说来，研究语言就是和那个国家的人民及其文化、文学等等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它的特点，它的道理和发展。

恩格斯通晓很多种语言，这使他有可能去研究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一般性问题。为对这些科学的研究奠定了稳固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恩格斯对语言学的研究，对他在 8 0 年代研究古代的日耳曼人的历史和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知识是他研究人类历史发展最初阶段的极其宝贵的源泉。

恩格斯在 8 0 年代初所写但并未完成的他那著名的《运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语言发生的观点的概括性的公式。

恩格斯在居留曼彻斯特期间继续进行了与他研究语言学有密切联系的研究世界文学的工作。在这个领

域中，恩格斯——那里最渊博的学者之一——也获得了辉煌的成就。他不仅精通欧洲各民族的文学，而且精通东方各民族的文学，不仅精通现代文学，而且精通过去历史时代的文学。例如恩格斯就非常熟悉俄罗斯文学，他读过捷尔沙文、普希金、格利波也多夫、杜勃罗留波夫、谢德林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

恩格斯认为文学和艺术是归根到底决定于社会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他揭露了文学和艺术中的各种流派之间的斗争的阶级根源。他主张文学和艺术应具有思想性，能告诉人们生活的真理，他主张现实主义，认为现实主义“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真实地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分散在恩格斯的许多论文和书信中的很多关于文艺问题的评论，是马克思主义对待文艺问题最宝贵的典范。

50年代末，恩格斯着手认真地研究自然科学：化学、物理学、生理学。他细心观察自然科学方面一切新的发现，并热情地把刚刚出版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评为“证明自然界的歷史发展的极好的尝试”。

恩格斯虽然每天必须坐在营业所并为商行和国外进行通信，但是他写出了大量的理论、文学和政治方面的著作，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讶。

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最初几年所从事的实际革命工作中，参加宪章运动占了很重要的地位。这个运动在1848年4月宪章主义失败后，就大大地低落了。英国成了“世界的工业作坊”，工业的特别蓬勃的高涨使部分最熟练的英国工人的状况得到了某些改善，这就促成了机会主义的情绪在这些人们中间的产生。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宪章运动的领袖费了很多力量重新布置工作，企图使运动再度恢复起来，而以奥康瑙尔为首的另一部分领袖却拒绝宪章运动的纲领，去和资产阶级激进派进行勾结。

恩格斯积极参加宪章派报刊的活动，并在曼彻斯特进行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他在1851年1月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我努力和这些青年(左派宪章主义者)组织小型的俱乐部或定期聚会，并将和他们讨论《共产党宣言》。”一个月以后，他从曼彻斯特寄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不久以后我们成立了一新的宪章派地方支部。”

恩格斯虽然尽了一切力量来帮助宪章运动在新的基础恢复起来，但是他对此并不抱任何幻想，他看到宪章运动已处于低落状态，已越来越分裂为各种集团，实际上已成为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尾巴。

## 第四章 第一国际前后的恩格斯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最困难的反动环境中继续进行争取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顽强不懈的斗争。这一斗争的成就就是1864年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

在这个时候，整个历史环境都是有利于建立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的。早在50年代末，反动的冰山终于被摧毁了。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特别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活跃，促进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觉醒。

恩格斯这时仍旧住在曼彻斯特，并且不得不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该死的生意经”上。他无法直接参加建立“国际”的工作，也不能直接参加“国际”的领导机关——总委员会的工作，但他还是很积极地帮助马克思领导“国际”，并和工人运动中的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作斗争。马克思把“国际”内部的情况，把他在总委员会中进行的斗争系统地告诉恩格斯；他在各种问题上都向恩格斯征求意见，不止一次地请恩格斯为总委员会的会议准备某些材料，例如恩格斯曾起草的关于萨克森煤矿工人联合会的详细

报告，这个报告由国际总委员会于1869年作为总委员会的德国书记卡尔·马克思的报告发表。

恩格斯在揭露拉萨尔派的“普鲁士国王政府的社会主义”的真面目时，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这样的怀疑：《社会民主党人报》简直已被俾斯麦所收买。历史完全证实了这种怀疑。

在和《社会民主党人报》决裂之后不久，恩格斯在1865年出版一本专门的小册子《普鲁士的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中详尽地批评了拉萨尔派。普鲁士的军事问题，即改组普鲁士军队的问题，这时在德国已经特别尖锐起来，并成了1862年就已经爆发的资产阶级和政府之间的所谓“宪制冲突”的根源。

恩格斯拿这次冲突作为具体例子说明了无产阶级政党怎样对待有产阶级中相互攻讦的两派，即地方及政府一方和自由资产阶级一方。

和拉萨尔派相反，恩格斯证明无产阶级在任何场合下都不能支持普鲁士的反动政府和地主。为了和资产阶级斗争，反动派有时也会向工人献媚，向工人做一些让步，甚至可以实行普选，例如路易·波拿巴就是这样做的。但是政府只有在给资产阶级找寻新的敌人对自己有利的时候，才肯做这种让步。一旦工人运动变成了一支独立的力量，政府就要加紧迫害工人运动，力图把它消灭。

恩格斯分析了资产阶级在宪制冲突中的行动，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普鲁士资产阶级表现得如此缺乏勇气，甚至在这个并不以勇敢见称的阶级的历史中找不到有类似的情形。他证明资产阶级由于惧怕独立的工人运动，一天天地倾向于和帝制妥协，准备着像在1848年一样地再背叛自己。工人应当揭露资产阶级软弱的和不彻底的政策，而如果资产阶级由于懦弱而背叛了自己，工人政党也应当不顾资产阶级而继续进行争取资产阶级民主，即争取出版自由、集会、结社权等等的宣传。“自然，在所有这些场合下工人政党都不能做资产阶级的尾巴，而要作为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独立政党出现”。工人政党将向工人说清楚他们的特殊的阶级利益，“并在最近一次革命风暴中（这种风暴现在会像商业危机、像春分和秋分时的风暴一样地定期重现）准备行动”。

恩格斯的这本小册子的基本思想就是这样。在这本小册子里，他根据60年代德国的条件把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拟定的策略具体化了。

1867年，马克思的天才著作，他多年的巨大理论工作的成果《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了；这对爱森纳赫派在和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中取得这些成就是起了不小的作用的。

马克思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资本论》第一

卷。

除了紧张的理论研究工作，他还要做领导“国际”的繁重工作。这样同时进行异常困难的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根本破坏了马克思的本来就已经受了损害的健康；此外，物质上的困穷给予他的压力即使不比以前大，也不比以前小。虽然恩格斯的帮助，从他做公司代理人，后来又做股东那时起，是大大地增加了，但是随着马克思的孩子们的成长，他的家庭的需要也增加了；此外，现在和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的时候也不一样了，他忙于“国际”的工作和自己的经济著作，几乎完全失去了稿费收入。因此，现在家里的东西连衣服都要送去典当，弄得门也出不了，甚至由于没有钱买稿纸而不能写作。

在这种困难的时候，有一次马克思又要找恩格斯帮助，写信告诉他说：“你可以相信，我宁愿斩断自己的大拇指，也不想给你写这封信。一想起一个人有半辈子要靠别人生活，简直叫人灰心丧气。支持我这样做的唯一的思想，是我们两人在经营一件合伙的事业，而我是把我的时间用在这一事业的理论的和党的方面。”

出于对朋友的热爱和忠实，出于党员对党的伟大领袖的无限关怀，恩格斯每次都急忙给马克思以帮助。他给马克思的信开头通常都是告诉他寄去了多少英镑，

这些信证明恩格斯对马克思和他的家庭的关怀是最令人感动和无微不至的。恩格斯由于马克思的健康急剧恶化而感到极大的忧虑，他和医生们商量，劝马克思来曼彻斯特休养，认真治疗疾病，因为这种病是极可能引起致命的结局的。

“假若你愿意为我和你的家庭做一件使人称心的事情，那你去把你的病治好。万一你出了什么事情，整个运动会怎样呢？如果你这样干下去，那你一定会弄到这个地步的。我确实日夜都感到不安，除非我能使人不出这种事。每一天，只要我得不到你的消息，我就担心，并且想着，也许你的情况又变坏了。”

列宁在他写的马克思的传记中着重指出：若不是经常有恩格斯在经济上慷慨援助，马克思就不但不能把《资本论》完成，而且一定会困死在贫穷的压迫之下。

在《资本论》的写作上，恩格斯的帮助并不限于在物质上关心马克思，马克思在一些最重要的理论问题上通常都和恩格斯商量，在信中陈述自己的结论，征求恩格斯关于某些问题的意见。马克思还时常在许多实际的经济问题上请教他的朋友——恩格斯，因为恩格斯对这些问题是很有研究的。

马克思在科学工作上过分严谨，在他还没有确信他已经读过每一本书，已经认真考虑过每一个反对意

见以前，他就不认为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为了这一点，恩格斯经常友爱地责备他。

恩格斯知道马克思的这种工作特点，由于这种特点，《资本论》第一卷的付排就无限期地延迟了，他就经常催促马克思，要他不等《资本论》其余各卷完成就出版第一卷。

当马克思开始从汉堡收到校样的时候，他就把它转寄到曼彻斯特去，以便听取他的朋友的意见，因为他认为这种意见是最宝贵的。

1867年8月16日，马克思通知恩格斯，他已经看完了《资本论》的最后一张(第49印张)校样。序言已送出去了，马克思写道：“这样，这一卷是完成了。这一工作之所以能够完成，完全要归功于你！没有你对我的自我牺牲，我是绝不可能完成三大卷的全部巨大工作的。拥抱你，衷心地感谢你！……敬礼，我亲爱的忠实的朋友！”

《资本论》第一卷的完成不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的最大的事件，而且是对整个工人运动、对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

关于《资本论》，恩格斯这样写道：“从地球上有了资本家和工人的时候起，还不曾有过一本对工人有如此重大意义的书。”

《资本论》以资本主义灭亡和新的共产主义社会胜利的历史必然性这一深刻的科学观点武装了工人阶级。在《资本论》中科学的共产主义得到了最深刻的和最全面的论证。这一天才的著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主义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一步。

列宁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足以称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续篇。他在这一著作和其他的一些著作中以对资本主义垄断阶段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研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从这一研究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新的、完备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由于马克思的严格的科学论证，仅仅诬蔑和咒骂是不行了，于是资产阶级科学界就……对《资本论》的出版保持沉默，只当它还没有写成。

为了冲破资产阶级报刊用来包围《资本论》的这堵沉默的围墙，恩格斯并不限于在当时为数不多的工人机关报刊或接近于工人运动的机关报刊上发表《资本论》的通俗的书评。他产生了一个奇特的想法——托人给某些资产阶级报纸寄一系列批评性的书评。1867年9月11日，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问他：“你考虑一下，为了把事情推动起来，我是不是应该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来写文章批评这本书？”马克思答

道：“你从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评这本书的计划是最好的军事手段。”

为了实现这个“军事计谋”，恩格斯利用某些志同道合的亲近朋友的帮助，把论文寄给他们作为榜样，以便他们能够在以后用不同的形式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发表。恩格斯在当时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展开对这本书的讨论，并迫使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发表对这本书的意见。

结果，恩格斯终于达到了在资产阶级报纸上发表一系列书评的目的。在这些书评中，恩格斯显示了藉批评的形式把马克思的观点传达给读者的惊人本领，以致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对的毕竟还是马克思而不是他的“批评者”。实际上，这些书评的锋芒是针对着庸俗的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恩格斯想尽办法挑逗他们对《资本论》发表意见）和拉萨尔的理论观点的。

《资本论》第一卷的完成，恩格斯认为不仅是马克思的生平的转折点的开始，而且也是他自己的命运的转折点的开始。现在出现了这样一种希望：马克思的稿费收入会增加一些，恩格斯也有可能永远结束商业生活，靠他脱离企业时可以分得的一笔不多的钱和稿费收入同马克思一起生活。当时，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曾经吐露过这样的话：“我对任何东西也不像对摆脱这种该死的商业生活那样热烈地渴求。”

但是，从《资本论》第一卷完成后，又过了两年多，恩格斯才实现了他的这个愿望。

1869年7月1日，恩格斯终于写信给马克思：“真好呵！从今天起再不搞这个宝贝商业了，我是一个自由的人了。”马克思对于从“埃及的幽囚”中逃出来的恩格斯报以热烈的祝贺。直到在恩格斯很高兴的这一天，他的朋友们才了解，在营业所里度过的这些漫长的岁月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当时，马克思的幼女爱琳娜(杜西)正在恩格斯家做客，以后她在回忆起这个可纪念的日子时说道：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早晨，当他穿上皮靴最后一次到营业所去的时候，他是多么高兴的喊着：‘最后一次了！’几小时以后，我们站在大门口等候他时，看见他从房子对面的一小片田野里走过来。他挥舞着手杖，满脸笑容地欢唱着。然后我们就像过节一样地大摆宴席，喝香槟酒，沉醉在幸福中。那时我很小，还不懂得什么，可是现在我想起这件事来，就不能不流泪。”

多年来压在他肩上的重担终于放下了，这种欢乐的情绪，在恩格斯给亲友们的信中可以感觉到。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今天是我自由的第一天。”

“我刚刚获得的自由使我感到高兴。从昨天起，我已经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年轻了十岁。”

特别使恩格斯感到高兴的，是在欧洲的暴风雨日益临近的时候，在可以感到重大的政治事变即将发生的时候，他能完全空闲下来从事科学的和政治的活动。1869年7月10日，他在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我用不着告诉您，我摆脱了这个该死的生意经并且能够再干我自己的工作是多么高兴，特别是这件事情正好发生在现在，发生在欧洲上的事件一天天地尖锐化而且将有那么一天会完全出人意外地喷发出暴风雨的时候。”

但是恩格斯为了结束自己的事务还必须在曼彻斯特逗留一个时期。由于他那时有了空闲的时间，他便着手进行爱尔兰历史方面的严肃的科学工作。为了更进一步认识爱尔兰这个被压迫的国家，这时恩格斯在他的妻子莉希·白恩士（已逝世的玛丽的妹妹）和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陪同下到那里去旅行。

恩格斯对爱尔兰发生兴趣绝不是偶然的。当时爱尔兰问题在“国际”内部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统治阶级人为地挑拨起来的英格兰工人和爱尔兰工人间的民族纠纷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了英国工人阶级软弱无力的秘密。他们认为“国际”的任务是唤起英国无产阶级意识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和仁爱的问题，而是他们自身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号召英国无产阶级去为爱尔兰的独立进行积极的斗争，因为爱尔兰的分离、它内部的土地革命都会是对英国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有力的打击，并推动英国本土的革命的开展。而英国的革命对大陆各国的革命运动又会发生强有力的影响。

列宁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爱尔兰问题的政策提供了最伟大的，到目前为止还具有巨大的实践意义的典范：一个压迫别人的民族的无产阶级应当怎样对待民族运动……”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爱尔兰问题的政策以及他们关于波兰、印度和中国的文章是列宁和斯大林进一步研究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基础。

恩格斯着手研究爱尔兰的时候，正是爱尔兰问题由于爱尔兰土地运动的新高涨的英国政府对爱尔兰革命者芬尼亚社社员的血腥镇压而特别尖锐化的时期。恩格斯的妻子莉希·白恩士，如恩格斯所说的，是“一个具有革命信念的爱尔兰女人”，热烈地同情自己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并积极地帮助逃避追捕并在恩格斯家里寻求种种帮助的爱尔兰革命者。恩格斯给予芬尼亚社员以一切援助，并同时批评他们那种阴谋策略和搞“阴谋小集团”的做法，批评他们和广大的爱好自由的爱尔兰人民群众缺乏联系。

恩格斯认为爱尔兰问题具有巨大的理论和政治意

义，因此，他想写一本关于爱尔兰历史的巨大著作，以便说明这个国家变成为英国第一个殖民地的过程，变成为“英国大地方的堡垒”的过程。恩格斯在1869年10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从爱尔兰的历史的例子中可以看到，如果一个民族奴役其他一个民族，那对它自己来说该是多么的不幸。”

恩格斯本打算把这部著作分四章来写，结果只写了第一章《自然条件》和第二章的一部分《古老的爱尔兰》。

恩格斯未能完成爱尔兰历史方面的著作。恰如他所预料的，巨大的政治事变在欧洲很快地成熟了。这些事变使得他在很长一个时候不能从事理论工作。这就是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

1870年7月19日，法国和普鲁士的战争爆发了。7月23日，国际总委员会就特地向各国工人发表了马克思就普法战争写的一篇宣言。

马克思号召工人不要让战争因普鲁士的侵略意图由防卸性的战争变成为侵略性的、掠夺性的战争。马克思在引证德国和法国工人所通过的一系列的宣言和决议时满意地指出：“在这次战争中，先进的工人已能站稳正确的和国际主义的立场。”“单是这一件史无前例的伟大事实，就使人们对未来可以抱有更大的希望。这个事实表明，跟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

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同样是要由劳动者统治的。”

“这个新社会的先声就是国际工人协会。”

恩格斯在1871年8月15日致马克思的信中给德国工人及其政党拟定了在普法战争的复杂条件下所应采取的策略如下：必须严格地分清民族德意志的利益和王朝普鲁士的利益；反对吞并亚尔萨斯—洛林；一俟共和的非沙文主义的政府在巴黎掌握了政权就努力争取和平；经常强调德国工人和法国工人的一致。他们都不赞成战争，不互相交战。马克思完全赞同这一路线，并以这种精神指导德国社会主义工人政党。

普法战争一开始，恩格斯就定期地给《派尔·麦尔新闻》（《Pall Mall Gazette》）投寄评论军事行动的通讯。恩格斯的这些《战争简评》的文章轰动一时，因为论文中关于军事行动进一步展开的预言，过了几天就一字不差地证实了，例如，恩格斯关于法军将在色当战败的预言就是这样。这些论文由于发表时没有署名，竟被认为是出于某一个大军事专家的手笔。

马克思曾写信告诉恩格斯说：“如果战争再继续一个时候，你很快就会被公认为伦敦第一个军事权威。”

恩格斯的论文在他那些知道这些论文是谁写的朋友中引起了热烈的赞美。

就是在这个时候，马克思的女儿燕妮给恩格斯送了一个“将军”的头衔。这个外号在他的亲近的朋友中一直保存了下来。

1870年9月，恩格斯从曼彻斯特来到了伦敦，并住在从马克思那里最多10分钟就可以走到的地方。现在，两个朋友可以经常见面，可以一起讨论他们以前不得不主要靠通信来进行讨论的一切问题了。

恩格斯每天都到马克思那里去，他们或者出去散步，或者呆在马克思的书房里。如爱琳娜·马克思所述说的，他们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各走一条对角线，走到屋角再回头，好几小时地谈论着各种不同的问题。有时一个问题要一连这样会面几次才能讨论完毕。

马克思的女儿劳拉的丈夫尔·拉法格说道：“我想起他们关于阿尔比哥派的争论，这次争论长达几天之久……为了能够取得一致的意见，他们在每次见面后各自都仔细地思考争论的问题。对他们说来，任何对他们的思想和著作的批评都不及他们彼此交换意见那样意义重大……。”

“马克思不断称赞恩格斯无所不知、称赞他头脑灵敏惊人，能够那样容易地从一个题目转到另一个题目，而恩格斯则赞扬马克思的分析和综合能力。”

恩格斯在迁居伦敦后，根据马克思的提议被选入“国际”总委员会。他现在极其愉快地埋头于政治的

和组织的工作。他和马克思一起领导着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运动，尖锐地批评那些不积极参加这个运动而且根本不努力反对英国对外政策的英国工联主义者，即“国际”中的那些工联主义者会员。在1871年1月底召开的总委员会会议上，恩格斯提出了揭露英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在总委员会中引起了长时间的热烈争论。

恩格斯在他的《战争简评》的文章中抨击俾斯麦政府实行掠夺政策和“用普鲁士式”的野蛮方法进行战争。他向为了打击明目张胆侵入国境的侵略者而拿起武器的法国游击队队员致敬。

在1870年9月4日的革命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警告法国无产阶级在普鲁士军队侵临巴黎大门的形势下不要过早地起义，劝告他们广泛地利用共和国所提供的公开机会来竭力加强自己的组织，这是胜利斗争的最重要的条件。

但是，当事变的过程、已展开的阶级斗争的必然趋势刚一引起了3月18日的革命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以无产阶级领袖的满腔热情急起帮助“准备翻天覆地的”巴黎工人，成为英雄的巴黎无产者的群众斗争的参加者。

3月21日恩格斯就在总委员会的会议上详细地报道了巴黎的事变。他根据巴黎的来信报告说：人民

已经取得了政权，参加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人，虽然不在“名流”之列，但是在工人阶级中是很有名的。在这次会议上，按照马克思的提议通过了号召工人支持和声援巴黎公社社员的决议。

在总委员会4月1日的会议上，恩格斯做了关于巴黎斗争经过的报告，指出了“公社”所犯的主要错误之一：“……选举以后只说不做。本来应当在凡尔赛还很弱的时候向它进攻，却错过了好机会，现在看来凡尔赛占了上风，并正在压迫着巴黎人。”但是恩格斯指出：工人“比过去历次起义都组织得更好”。

恩格斯非常积极地参加了“国际”总委员会在马克思领导下所展开的紧张工作，即动员国际无产阶级和法国工人去帮助革命的巴黎。

恩格斯把革命活动看做是生活中最大的快事，他在国际中展开了巨大的实际组织工作。

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大批流亡者从巴黎奔向伦敦，这时恩格斯是负责总委员会对流亡者的资助工作的中心人物。

作为许多国家的通讯书记，恩格斯总是尽快地帮助每一个和自己的压迫者进行尖锐搏斗的无产阶级队伍，他组织了对安特卫普的雪茄工作和布鲁塞尔工人的罢工运动的广泛援助，他号召伦敦工人支援巴塞罗纳纺织工人的罢工、萨坦德制桶工人的罢工、瓦伦西

亚制革工人的罢工等等。每经这样一次罢工以后，都有新的无产阶级队伍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行列。

恩格斯刚好是总委员会中那些最难领导的支部的书记。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巴枯宁主义的秘密组织像网一样分布着，而且这些国家里的“国际”支部的领导人往往受着巴枯宁的影响。

在恩格斯以总委员会的名义向各国支部领导人发出的指示和通知书中，他广泛地宣传了巴黎公社的经验和教训，耐心地不懈地解释工人阶级的科学的战略和策略的基础，委婉地纠正各支部领导人所犯的某些巴枯宁主义的“毛病”，并向巴枯宁及其代理人进行猛烈的斗争。

恩格斯早在给“国际”西班牙联邦委员会的第一封信中，就说明了巴枯宁主义者所宣传的不要过问任何政治的错误和危害性，并同时指出：使无产阶级能摆脱维护有产阶级利益的旧政党影响的最好方法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这个党应当执行独立的政策以便达到解放工人的目的。

恩格斯写道：“有产阶级，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不仅用自己财产的力量，即通过资本剥削劳动来奴役劳动人民。放弃跟我们的敌人在政治舞台上的斗争就是放弃了最强有力的斗争手段之一，特别是放弃了像组织和宣传这样的斗争手段。”

由于要召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971年9月)，恩格斯展开了巨大的工作；他是会议议程委员会的主席。恩格斯在他关于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演说中向代表指出，放弃政治是荒谬的、有害的，特别是在已把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提到日程上来的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更是荒谬的和有害的。“我们要消灭阶级。用什么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呢？——只有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当这一点已经变得再明显不过的时候，还有人要我们不去干预政治！”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着重指出：无产阶级只有组织成一个独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反对有产阶级的集体政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并且达到最终目的——消灭阶级，就必须有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伦敦代表会议在决议中谴责了各种宗派组织，并扩大了总委员会的职权。

恩格斯用全力反击巴枯宁主义者对“权力”、“权威”、集中和纪律的进攻。他在给都灵支部信中写道：“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革命更有权威的东西，我觉得，如果像革命时那样利用炸弹和枪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那就正好是实现了权力的行为。巴黎公社就断送在缺少集中和权力上……而当人们向我说，权力和集中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加以谴责的两个东西时，我觉得，说这种话的人若不是对革命无知，就只是口

头上的革命家。”

恩格斯在他一系列的书信和文章中批评了由蒲鲁东主义和共产主义混合而成的巴枯宁的理论观点，首先批判了他的国家观点。巴枯宁认为应当消灭的主要祸害不是资本，因而也不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而是那必须被消灭的国家，在未来的社会里将以“国际”的组织来代替它。恩格斯在给“国际”米兰支部的组织者德奥多·库诺的信中说明这一类观点的错误和危害性时写道：“在这个社会中首先没有任何权威，因为权威，也就是国家，是绝对的祸害。（如果没有一个最终决定的意志，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这些老爷又怎样经营工厂，管理铁路和驾驶轮船呢？自然，这一点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们。）多数人也不再统治少数人了。每一个人和每一个集团都是自治的，但一个社会，即使只有两个人，如果每一个人都不肯放弃自己的某些自治权，又怎么能够存在呢？关于这一点巴枯宁却又一声不响了。”

“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给了巴枯宁主义者彻底的打击。为了准备这次代表大会，恩格斯积极地进行活动。他担任了代表大会的章程起草委员会的主席，并在7月2日总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提议扩大总委员会的全权，赋予它在下次代表大会以前开除个别支部和联邦委员会的权力。他和许多支

部广泛地通信，并在信中不倦地揭露巴枯宁的公开和暗藏的代理人，竭力弄清哪些人是优秀分子并把他们团结在总委员会周围，进行细致的组织工作，计算每一个表决权、每一张委托书，以保证马克思的拥护者在代表大会上有所团结而可靠的多数。

使恩格斯特别操心的是爱森纳赫派的领袖们。他曾经不得不多次地、尖锐地批评他们对“国际”的“有名无实的关系”，批评他们漠视自己的国际义务。恩格斯以总委员会的名义坚决要求李卜克内西以积极的行动来准备代表大会，以便保证德国工人在代表大会上能够获得更充分的代表权。恩格斯在1872年5月22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写道：“事情严重起来了，我们必须了解我们拥有的力量，否则你们就会逼得我们独立行动，逼得我们把社会民主工党看做是和我们不相干的并且对‘国际’漠不关心的组织。”

随着巴黎公社的失败和第一国际的解散，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来到了，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它带有“和平的”性质和没有革命。“西方已经结束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东方尚未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地点，西方进入了迎接未来的改革时代的‘和平’准备阶段”。

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把注意力的中心转移到下面两点：在个别的国家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训练这些政党使它们能够在将来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无

产阶级专政而进行决斗。马克思和恩格斯培养了这些政党的领导干部，在他们制定纲领、战略、策略时提供意见，并周密的估计到每一个国家的特点、经济情况、阶级力量对比，估计到妨碍这一国家内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和建立群众性无产阶级政党的那些障碍。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帮助各国建立社会主义政党时所注意的，主要是为争取党的社会成分的纯洁、为清除党内各种各样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为达到理论和实践的统而斗争。

自从第一国际解散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和统一作用不但没有减弱，而且加强了，也更为复杂了。对一系列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必须经常进行实际领导，对公开或隐蔽的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必须进行斗争，现在，这一重担主要是落在恩格斯的肩上了。恩格斯在谈到这个时期时写道：“由于我和马克思的分工，在定期刊物上，尤其是在和敌对观点斗争时陈述我们的见解的任务就由我来担负了，这样，就使马克思有时间完成他的伟大的主要著作”。恩格斯在这里所提到的发表于定期刊物的文章也包括和各国社会主义者的通信在内，现在这些书信大部分由恩格斯来写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争取在各国建立社会主义政党

的斗争中，特别注意德国的工人运动。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工人运动的重心暂时已转到了德国。

德国工人在巴黎公社以后领导了国际无产阶级并最先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恩格斯在他的许多书信和论文中曾深刻地分析了产生这一事实的原因。他认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德国工业的发展比英法来得更晚，也更蓬勃。1848年后在德国开展起来的产业革命，给农民和手工业者带来了破产，加强了对工人的剥削。为了能在世界市场上和资格较老的工业国家竞争，德国的企业主必须在技术上改进自己的企业并压低工人的工资。这一切都促使阶级关系尖锐化，促使工人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更深刻和更迅速地革命化。

除了产业革命的深入和由此引起的阶级斗争尖锐化之外，恩格斯认为德国工人运动能起先锋作用的原因还在于：这一运动从马克思主义中获得了它的先驱者——英国人和法国人从未有过的纲领。

但是，尽管具备了这些有利的条件，德国工人政党的形成也决不是轻而易举的。独立的工人政党是在反对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反对他们企图控制工人运动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也是在经常和侵入党内并表现为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影响的斗

争中建立起来的。

恩格斯在他的书信以及在发表于工人报刊的许多文章中对拉萨尔派继续进行了不倦的斗争，同时帮助爱森纳赫派纠正路线的错误，反对他们理论上的幼稚和政治上的错误。

爱森纳赫派理论上幼稚的一个例子就是1872年医学博士米尔柏格在他们的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Volksstaat》)上发表的一系列关于住宅问题的文章。

由于当时德国已完成了轰轰烈烈的产业革命，住宅问题便显得特别尖锐，成了在报刊上进行广泛讨论的题目。在这一讨论的过程中形形色色的“社会骗子”都浮到表面上来了，米尔柏格就是其中的一个，而爱森纳赫派竟允许他们在他们的报纸上发表言论，这使恩格斯非常吃惊和愤怒。恩格斯向爱森纳赫派抗议发表米尔柏格的文章；并写了许多论战性的文章来驳斥米尔柏格，这些文章后来编成了《住宅问题》这一小册子出版。

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地研究了巴黎公社失败后在法国开展工人运动的条件，以及运动的内部过程。恩格斯认为，巴黎和外省之间的脱节是上次革命运动的一个根本缺点，外省不仅没有支持革命的巴黎，甚至还直接反对巴黎。恩格斯指出，1871年以后“革

命的巴比伦”和外省的那把剪刀已开始合拢，革命的后备军，首先是农民，已开始奋起，这是当时的一个好现象。

恩格斯认为另一个现象是巴黎公社的经验致命地打击了过去在法国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各种小资产阶级理论——蒲鲁东主义、布朗基主义等等。这就使法国工人易于抛弃卓越的特殊的法国社会主义，掌握国际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

但是，就在这时开辟一条使马克思主义走向法国工人群众的道路也绝不是没有斗争的。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各种各样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分子，他们继续维护着陈旧的已被实践证明是破了产的理论。某些法国社会主义者由于本国的革命传统而妄自尊大，他们不愿意从德国人马克思手中接受革命理论——这类因素在这方面也起了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除领导工人运动外，还继续他们的理论工作，他们认为理论工作是自己为党工作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恩格斯写信给贝克尔说：“马克思和我们都必须进行完全确定的科学工作，这种工作是我们到现在为止还只好肯定地说没有别人能够而且愿意担当起来的。我们必须利用世界历史上现在这个安静的时期来结束这个工作。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发生什么事件重新把我们抛到实际运动中的漩涡中去；尤其是我们应该利用这个短暂的

空闲时间来发展运动，这个同样重要的理论方面，即使稍微发展一下也是好的。

马克思这时的主要理论工作是写作《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这个工作现在愈来愈频繁地被马克思的病打断了。

至于恩格斯，他一面从事着普及马克思主义并在报刊上捍卫马克思主义不受敌人攻击这样巨大的工作，一面深入地研究了自然科学。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时，就已经开始抽空研究自然科学；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他就着手写作一部关于自然辩证法的巨著。他写好了这本书的“导言”，但是由于必须对杜林的著作进行批判，以致不得不停止这个工作。在写完《反杜林论》之后（1878年6月）恩格斯又回过头来写自己的著作，写了已经可以说是完成了几章和许多零篇的札记及草稿。可是，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搁下了这一工作；因此，这一著作也就一直没有完成。恩格斯的这部著作被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袖埋没了30年之久，直到1925年才在莫斯科第一次以德文和俄文出版。

《自然辩证法》虽然并没有完成，但就思想的深刻和丰富而论、就其全部理论意义而论，仍然是一部卓越的著作。

这本书的“导言”包含从文艺复兴时代到达尔文

为止的自然科学发展的出色的概述。恩格斯追述辩证的自然观如何在反对形而上学观点的斗争中一步一步给自己开辟道路。恩格斯在这里强调实践的作用、生产的作用，因为归根到底生产是制约着科学的发展的。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给当时的自然科学所得到的结论做了哲学的概括，指出自然界的一切都是辩证地进行的，所以认识自然界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

恩格斯探讨物质运动的各种不同方式、它们的统一和互相转化、它们的质的特点，他给自然科学做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分类。

恩格斯在这部著作里始终和伪科学、和僧侣主义进行着不可调和的斗争。恩格斯批判唯心主义者和庸俗唯物主义者，反对形而上学粗糙的经验主义，他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自然科学基础。

恩格斯在自然科学和数学的一切部门中反对旧学说的信徒，支持当时科学中一切新的进步的东西。

恩格斯用最先进最革命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来观察自然科学的现状，他向前看得很远，提出了一系列非常有成效的科学假设，预料到一系列最新的科学发现。例如和同时代的大多数学者不同，恩格斯坚持这样的观点：原子是复杂的，原子并不是简单的最小的物质粒子。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证实了恩格斯的

这个观点。

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篇出色的短论中，恩格斯指出劳动在人的机体的形成方面、在语言的起源方面、在人类社会的形成方面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

就这样，恩格斯根据大量的材料在自己的著作中树立了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应用唯物辩证法的卓越的榜样。虽然在关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个别细节上，由于后来这些科学又有了巨大的进步以致恩格斯的某些论点变得陈旧了，可是《自然辩证法》在我们这个时代仍旧有巨大的科学价值和哲学价值。

恩格斯这本出色的著作《自然辩证法》，列宁并不知道。然而列宁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好像是恩格斯所开始的研究工作的继续和发展一样。列宁在这本书里唯物地概括了恩格斯逝世后的科学，首先是自然科学所获得一切有价值的成果，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恩格斯没有能完成自己的著作《自然辩证法》。

1883年3月14日发生了迫使恩格斯暂时放下也永远放下了完成这一巨著的工作的事件。这就是马克思的逝世。

3月14日晚，恩格斯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所遭

受的巨大损失打电报通知了朋友和战友们。恩格斯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写道：“虽然今天晚上我看到他一动也不动的躺在安乐椅上，他的面孔永远僵硬不动了，但我仍然不能想像，这个伟大的天才已经不再运用他那有力的思想来丰富两半球的无产阶级运动了。”恩格斯通知贝克尔说：“我们党的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我生平所知道的一颗最强有力的心停止跳动了。”

马克思的逝世对恩格斯来说是双重悲痛的事件。由于马克思的逝世，他不仅失去了他所终生从事的运动的天才领袖，也失去了第二个“自我”，失去了全部自觉生活中的同伴，失去了忠实的朋友和斗争中的战友。

1883年3月17日，马克思安葬于伦敦的海格特公墓。恩格斯在朋友的墓前发表了动人的演说，描绘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科学功绩和他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为一切劳动者和被压迫者的事业奋斗的自我牺牲的英雄的一生。恩格斯以下面的预言结束了自己的演辞：“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恩格斯在他一生最沉痛的日子里，在把马克思逝世的消息通知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时候，并没有丧失锐气，没有为这沉重的打击所压倒。

他在马克思逝世的第二天给贝克尔的信中写道：

“现在，我们大概是1848年以前的老战士中的最后两个了。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我们还要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子弹呼啸着，朋友们倒下去了，但这对我们两个并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如果我们当中有谁被子弹打中，那就让它打中吧，但是希望能命中要害，不要让我们长时间地受折磨。”

## 第五章 马克思逝世后的恩格斯

马克思在世的时候，恩格斯竭尽全力为马克思的天才开辟道路并帮助自己伟大的朋友写作《资本论》，马克思逝世以后，他更毫不犹豫地放下了自己的科学工作，将其余生来完成由于马克思的病和死而中断了的工作——《资本论》的出版。

恩格斯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出版《资本论》第二卷的手稿。关于这些手稿，马克思在逝世前不久曾经对他的女儿爱琳娜说过：恩格斯应该把这个手稿“整成个东西”。接着应当出版的就是《资本论》第三卷以及第四卷的手稿（《剩余价值学说史》），且不谈许多其他篇幅较小的著作了。

恩格斯在开始整理《资本论》手稿时已经63岁，因此，他常常担心完不成这项工作。要从事这一工作就必须辨认马克思的潦草不清的笔迹，整理这些手稿并把它们合并成一个整体，这除了恩格斯是谁也做不到的。

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不久便病倒了，几乎有半年的时间不能够整理《资本论》，他写信给拉甫罗夫说：“这使我特别担心，因为现在活着的人中只有我

才能辨认这种笔迹和个别字以及整个句子的缩写。”恩格斯通宵不停地抄写手稿，企图这样来弥补因生病而失去的时间。结果病很快就复发了，因此，医生又禁止他伏案工作。于是病中的恩格斯就决定，如他所说的，“采取英勇的措施”。他请了一名助手，每天从早上10时到下午5时躺在沙发上向这个助手口述手稿。

但是，抄写手稿只是工作的一部分，而且不是最主要和最困难的部分。此外，还需要进行很多的科学研究工作，这一工作除恩格斯之外也是没有人能够完成的。除了个别的论述得很详细的部分外，在原稿里还有一些同样重要的部分却只有一个大纲。某些片断由于后来的加工就有好几种不同的手稿。恩格斯必须仔细地研究原稿，研究如何编辑个别的片段，必须进行许多补充，当然主要的也还是文体形式上的工作。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中强调指出他是尽量“完全根据作者的精神”来完成这些任务的。

1885年2月，恩格斯完成了《资本论》第二卷手稿的整理工作并把它送去付排。

接着恩格斯立刻开始了第三卷的口述工作。他写道，包含有许多最后结论的第三卷“将在整个经济学中引起彻底的变革”。马克思的这个著作“是一部光辉的杰作。这是对旧经济学的真正空前的摧毁。现在

我们的理论才有了不可摧毁的基础，我们能够顺利地  
和任何敌人进行斗争了”。

第三卷的最后编辑工作需要恩格斯付出极大的劳动。他必须把这卷的材料加以整理安排，并做了许多必要的更动和补充（对这些更动和补充他每次都加以详细的说明）。恩格斯非常仔细地并以极大的热情来整理马克思的异常珍贵的遗稿。他写道，马克思的遗稿对他来说是“在科学研究中获得最大愉快的泉源”。他在写信给贝克尔时说：“要整理马克思这样每一个字都贵似黄金的人所留下的手稿是需要花费不少劳动的。但是，我喜欢这种劳动，因为我重新又和我的老朋友在一起了。”

列宁谈到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所进行的艰巨而复杂的工作时，写道：“……这两卷‘资本论’确实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

恩格斯为整理《资本论》第三卷，几乎工作了10年之久。这不仅是由于这一著作卷帙浩繁和极其复杂，不仅是由于恩格斯的视力衰退，而且还有许多其他原因。恩格斯在进行《资本论》第二和第三两卷的出版工作时还担负了许多其他的工作。

除了1886年完成的《资本论》第三卷和第二卷的再版工作，同时也还要准备出版和翻译马克思的其他许多著作（《哲学的贫困》、《拿破仑第三政变记》、

《法兰西内战》、《法兰西阶级斗争》等)以及他自己的著作,并给这些著作写序言。

在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在世的这12年当中,恩格斯自己所能写成和发表的理论著作是为数极少的。恩格斯把其中最大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也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是执行”马克思的“遗言”。原来马克思曾经想写这样一本书,并为此收集了材料,但是没有来得及写作他就逝世了。马克思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曾做了摘记并附有批评意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就利用了这些材料。

恩格斯的这部著作在研究唯物史观问题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恩格斯在这本书里阐明了人类社会遥远的过去,给马克思主义研究上古史、家庭的起源及其各个发展阶段和形式奠定了基础。这本书的主要之点,它的中心就是对国家的产生、发展和将来衰亡的条件所做的历史的分析。恩格斯分析了从原始社会起的人类各个历史时期,而这一分析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大量的历史和政治材料写成的”(列宁)。根据这一分析,恩格斯阐明了阶级产生的过程、国家的起源、国家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以及在各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特点和形式。

除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外,我

们还必须指出恩格斯的出色的小册子《费尔巴哈论》（1888年出版）。这本小册子包括了恩格斯批评施达克《费尔巴哈论》一书的一系列的论文（1886年发表于《新时代》[《NeueZeit》]杂志）。恩格斯在这本小册子里扼要地说明了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学说，以及这些学说对马克思和他自己的观点的形成所起的影响，同时也揭露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的根本缺点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恩格斯在这本著作里和在其他著作里一样，也是从两个哲学营垒——唯物主义营垒和唯心主义营垒——的斗争的观点来观察一切问题的，从而也就捍卫了哲学的党性。

恩格斯在90年代初期写给鲍·恩斯特、约·普洛赫、弗·梅林、海·施塔尔根堡和其他等人的信，也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在这些书信中恩格斯反对庸俗历史唯物主义者，他们硬说经济要素才是历史过程中唯一的积极动因，而政治的和思想的上层建筑只不过是消极结果，对历史毫无影响。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论断就导致了对历史的宿命论的看法，即把历史看做没有人的参与和不通过人的活动而进行的自动过程。恩格斯阐明说，经济要素的自动作用并不存在，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在历史过程中经济条件只有在最终的意义上才是决定性的条件，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国家政权，却反过来影响社会经济。恩格斯

在1890年10月27日写给卡·施米特的信中说：“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话，那末我们为什么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

恩格斯没有来得及回头来写完他的关于爱尔兰历史的著作和《自然辩证法》就逝世了。他也没有完成他在马克思去世后所拟定的那个庞大的写作计划。

恩格斯本来还打算写一本详细的马克思传，写一部关于1843 - 1863年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和第一国际的历史。可是他仅仅发表了一篇简短的马克思传、一些论文和序言。恩格斯在这些论文和序言里叙述了他和马克思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共同斗争的最初阶段。

这样，虽然恩格斯认为阶级斗争的理论战线具有巨大意义，虽然他知道没有人能够在理论方面代替他和马克思，但是他还是没有来提及完成他所想要写的许多理论著作和准备出版《资本论》第四卷的原稿。

如果考虑到恩格斯在这整个时期中在领导国际无产阶级运动方面所进行的艰巨工作，这就是可以理解的。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里解释他编辑这卷的工作进展迟缓的原因时写道：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增长，各方面要求于他的帮助，大大超过了不致影响他的理论工作的限度。恩格斯写道：“但我这样的

人，既然50多年来都在这个运动中活动，那末因此产生的各种工作，对于我，就是一种不能规避必须立即执行的义务。”

他在给贝克尔写的信中这样说：“我一生所做的都是我预定要做的事情——我演的只是配角——而且我想我还做得不错。我高兴我有马克思这样出色的主角。当突然要我在理论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而演主角时，就不免会有失策的地方，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可是只有在革命风暴更猛烈地来到时，我们才会真正感到失掉了像马克思那样视野广阔的人，在需要坚决行动时，他总能找出正确的道路，并立即将矛头指向应当打击的目标。诚然，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有时事件证实正确的是我，而不是马克思，但是在革命的时期，他的判断几乎永远是正确的。”

要知道在这个时期领导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任务如何伟大如何复杂，就必须估计到，这个运动的范围大大地扩展了，各国的斗争条件和斗争性质都彼此不同。为了领导各个社会主义的政党，恩格斯仔细地 and 全面地研究每个国家的情况，注意日益壮大的社会主义报刊事业，为社会主义的报纸写指导性的文章，和一些社会主义者进行广泛的通信，并在伦敦自己家里接待许多访问者。

列宁写道：“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一人继续担负着欧洲社会主义者的顾问和领导者的重任。无论是那些虽受到政府的迫害，但力量仍不断迅速增长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或是落后国家内那些还须仔细考虑斟酌自己行动步骤的社会主义者，如西班牙、罗马尼亚和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同样向恩格斯征求过意见，请求过指导。他们都从年迈的恩格斯的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宝库中得到过指示。

恩格斯在和改良主义及小资产阶级革命性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时，并不限于只提出忠告和给予指示，而是坚决顽强地为实现这些忠告和指示而进行斗争，他密切地注意每个政党的活动，并坚决果断地要求它们改正路线中的错误。

论到英美社会主义运动时，恩格斯特别严厉地批评了运动脱离工人群众、关门主义和教条主义，以及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用于英美的具体条件。

恩格斯注意到英国和美国的特点，在那里无产阶级由于种种经济条件 and 政治条件在这个时期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政治独立性，在政治方面只是跟着那个以欺骗、腐蚀和收买工人闻名的资产阶级的尾巴跑。

这些国家里党的最主要任务就是在政治上唤醒工人运动，把它推动起来，即使在不高的理论基础上，也应该把工人群众组织起来，只要能冲破资产阶级影

响这堵堤坝就行。

因此，恩格斯严厉地批评了在美国的德国社会主义者，他们不善于把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运用于美国的具体条件，而企图从上面强迫落后的和对任何理论都漠不关心的美国工人接受这个理论。

恩格斯认为美国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遵循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 - 1848年的策略，“参加工人阶级一切真正带普遍性的运动，实事求是地来考虑他们的实际出发点，把他们逐渐提高到理论水平上来，并向他们指出每一次所犯的错误，每一次失败，都是原来纲领的错误理论观点的必然结果。用《共产主义宣言》中的话说，他们必须在目前的运动中坚持运动的将来”。

这就是恩格斯所要争取在美国建立先进群众性工人政党的唯一实际的、适合美国条件的道路。这就是他耐心地和顽强地教给美国社会主义者的策略。

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跟美国有某些相似的地方。在这个国家里，到了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早就预料到的工人运动的活跃终于来到了。英国丧失了以前的工业垄断地位，进入到使广大的工资低微的工人群众物质状况急剧恶化的经济萧条阶段，这就是工人运动活跃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然而，虽然群众运动高涨起来了，80年代前半期产生的社会主

义组织却是一些彼此极端仇视、对工人几乎没有任何影响的派别。这些组织的领导者——鼓动者和“冒牌的党的领袖们”（如恩格斯所写的）——成了无军之将。他们有些像1849年巴登进军中罗伯特·勃鲁姆的有名的队伍，这个队伍是由一个团长、十一个军官、一个号兵和一个战士组成的。

在英国，恩格斯也努力培养出一批理论上有所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批和群众性工人运动有联系并能奠定真正工人政党基础的干部。他和妄图垄断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眼光狭小但野心极大的社会主义派别”——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联盟及其领袖海德门进行了无情的斗争。后来事实证明，恩格斯把海德门看做一个毫无原则的野心家是完全有根据的。

恩格斯参加了领导分裂社会民主党人联盟的准备工作。在他的家里召开了这个组织的左翼反对派的会议。但是，当社会主义者联盟（这是1884年末由于社会民主党人联盟的分裂而形成的）尚未在实践中证实它的路线是正确的以前，恩格斯也并不急于和它团结。不久社会主义者联盟便滚到无政府主义的泥坑里去了，而恩格斯的拥护者也就都离开了这个联盟。

恩格斯也同样坚决地反对1884年成立的费边社。这个组织的大部分成员是悉尼·韦伯和萧伯纳一类的知识分子、学者、作家等人。他们自命为社会主

义者，而事实上，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只不过是“自由党的一个支派而已”。“这是一帮各色各样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从利欲薰心的钻营之徒直到多愁善感的社会主义者和慈善家，他们只是因为慑于工人统治的威胁才联合起来，并且为了预防这种危险，保证领导权属于自己，属于‘有教养的人’，决心什么都干。”

恩格斯自己也非常积极地参加了这个运动。他把一批社会主义者，如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他的丈夫艾威林以及跟着他们走的无产者如托马斯·曼、约翰·白恩士等团结在自己周围。艾威林夫妇根据恩格斯的主张和指示，在伦敦工人区——东头——积极地展开了活动，在争取8小时工作日和建立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政治组织口号下，在激进工人中进行了鼓动。艾威林夫妇、白恩士和托马斯·曼在组织80年代后期的罢工斗争和建立非熟练工人工联的工作中起了卓越的作用，而他们的领导者就是恩格斯。

当许多主要国家尚未建立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政党时，当欧洲和美洲的政治形势尚未尖锐到非把组织新“国际”的问题刻不容缓地提到日程上来不可时，恩格斯拒绝一切要求着手建立新的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建议，认为这些建议是为时过早的。

恩格斯所想象的新的“国际”是“纯粹共产主义

的国际”，这个“国际”“将无条件地提出我们的“原则”，它将“不仅是一个宣传的机构，而且必然是一个积极活动的机构”。恩格斯认为建立这样一个“真正的国际”的时机还没有到来。但是，19世纪80年代末，工人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派和机会主义派就1889年在巴黎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以法国可能派和海德门的社会民主党人联盟为首的机会主义分子积极准备建立国际组织。这时，恩格斯为了打破这些组织机会主义国际的企图，就又像青年人一样地投入了战斗。

恩格斯为了粉碎这个计划，为了与可能派的代表大会相对抗，让法国工人党所建议的在巴黎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获得成功，三个多月以来他放下了其他工作，狂热地展开了活动。他在他的通信中痛责法国人——盖得和拉法格，因为他们在准备代表大会时，动作迟缓，犹豫不决。李卜克内西也受到了恩格斯的谴责，因为他不是代表有影响的德国党来坚决反对可能派的代表大会，从而动员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也起来反对这个代表大会，而是按照自己所固有的习惯企图使敌对的双方互相调和，梦想把这两个代表大会联合起来。此外，恩格斯藉伯恩施坦和爱琳娜·马克思的帮助在英国积极地展开了反对社会民主党人联盟的运动。

恩格斯认为，为建立第二国际而展开的斗争是第一国际内旧的斗争的继续，是海牙代表大会斗争的继续。他在给左尔格的信里写道：“这里的敌人还是那些敌人，不同之处只是用可能派的旗帜代替了无政府派的旗帜；这里同样是为了换得细小的让步，主要是为了领袖们能取得一些肥缺（市政委员会委员，劳动介绍所理事等）而向资产阶级出卖自己的原则。甚至连策略都是一模一样的。”

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斗争是保证巴黎代表大会获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在这个代表大会上成立了第二国际。可能派和社会民主党人联盟想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担当领导角色的企图遭到了失败。

英国工联的机会主义领袖们力图夺取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这个企图同样遭到了恩格斯的坚决回击，而这些人面目早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就被马克思揭穿了。马克思指出他们已为资产阶级和政府所收买。恩格斯动员社会主义者的力量来坚决回击工联领袖们的这种野心，号召社会主义者用实际行动表明，“具有阶级觉悟的大陆上的无产阶级，是决不想去受那些认为雇佣劳动制度是永恒的和不可动摇的世界秩序的人们领导的”。

恩格斯一面和改良主义者以及调和主义者进行了斗争，一面在“国际”里和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像纽文

葛斯一类的“左派”无政府主义分子进行了斗争。恩格斯拥护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91年）把无政府主义者开除出国际的决议。

在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以每年5月1日为国际无产阶级节日的决议。恩格斯认为这个节日是战斗无产阶级的第一次国际性的行动，他在1890年5月1日为《共产党宣言》德文新版写了一篇序言。在这篇序言中，他追溯了《共产党宣言》在面世以后的经历，并且指出，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1848年以来的工人运动的历史。恩格斯回想起42年以前当他和马克思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时，响应者还寥寥无几。但是从那时起，工人运动已经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恩格斯认为国际无产阶级的五一节就是这个发展的证明。最后，他这样写道：“今天的情景定会使全世界资本家和地主们看到：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已经真正联合起来了。”

虽然恩格斯已经上了年纪，但是每个“五·一”节他仍然坚持参加英国工人的游行，并登上作为讲台的四轮车发表演说。本来，恩格斯是不大愿意在大庭广众中讲演的，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大行的”演说家。

恩格斯亲自出席了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即1893年的苏黎世国际代表大会。在大会闭幕时，他先

后用英、法、德几种语文发表了演说。恩格斯为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对他的热烈的欢迎所深深感动，他在演说中曾经指着马克思的像声明，他认为这种热烈的欢迎不是对他个人的，他“只是以一个伟人的战友的身分”来承受这份盛情的，“这个伟人的像就挂在那里”。恩格斯说：“自从马克思和我加入运动，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第一批社会主义的论文以来，已经过去整整50年了。从那时起，社会主义已经由许多小派别成长为足以使整个官方世界胆颤心惊的强大的政党。马克思已经死了，假如他现在还活着的话，那末在欧美两洲是不会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有权骄傲地来回顾自己毕生的事业的。”

恩格斯赴苏黎世参加代表大会时，顺便访问了维也纳和柏林。恩格斯的这次旅行竟成了胜利的行进。像在苏黎世一样，他在这两个城市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时强调指出，他所以受到这样热烈的欢迎并不是由于自己的功劳，而应当归功于伟大的马克思，他不过是马克思的合作者和战友而已。他在维也纳时说：“即使50年来，我对我参加的运动做出了某些贡献，我也不希望任何报答。对我来说最好的报答就是你们（群众热烈鼓掌表示赞成）。对我的报答是整个世界！我们有许多同志在西伯利亚的监牢里，在加利福尼亚的金矿中，在各个地方，一直到澳大利亚……我

们这些人就是一个使整个世界为之震惊的伟大强国，是一个比其他强国更能决定一切的强国。这就是使我感到骄傲的地方！”

随着第二国际的成立，恩格斯所从事的党的活动和政治活动也更加加强了。他密切地注意着新的国际组织的活动，对任何脱离无产阶级路线的企图都立即给以反击。

恩格斯最担心的是盖得领导的法国工人党。由于 90 年代初期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了巨大胜利，党的领袖们就产生了机会主义的动摇，他们开始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攫取”票的斗争上。为了建立一个人数尽可能多的国会党团，盖得派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竟使他们的代表去和以米勒兰、饶勒斯为首的激进社会主义者的代表联合起来。在这个联合的党团中，盖得派只占无足轻重的少数，因此，领导权实际上就转到米勒兰一伙人手里。恩格斯认为这种“政略结婚”是极端危险的，他警告大家提防这种危险，并坚决反对“社会主义者服从米勒兰派，因为米勒兰派的实际纲领与其说是社会主义的，不如说是激进的”。他指出和这些先生们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并建议准备这个分裂。

恩格斯在他逝世的前一年，激烈地反对了盖得派在土地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这是因为 1894 年工人

党南特代表大会通过了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土地纲领，以及福尔马尔在德国土地问题上发表了一系列机会主义的演说，而德国党的领袖们也没有加以应有的反击。

恩格斯不止一次指出，小资产者和农民蜂拥而起的事实证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向我们靠近的事实证明：无产阶级事实上已经成为领导阶级。但是因为他们随身带来了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思想与意图，所以不应当忘记，如果无产阶级对这些思想和意图让步的话，那它就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的领导作用。

恩格斯认为南特纲领正是这种极端危险的机会主义的让步，这个纲领不向农民说明“资本主义的大规模生产将像火车压碎独轮车一样地压碎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却答应永远保持农民所有制。

同时，恩格斯强调指出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和它对社会主义政党的意义。为了夺取政权，甚至在工业最发达的国家，社会主义政党也必须到农村去，在那里建立起威望来。但是，恩格斯在向这些党指出农村工作的必要性时，他也反对在选举中无原则地追求农民的票数，反对想把农民中那些按其地位来说不可能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阶层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企图。

恩格斯着重指出，对农民、对农民中极不相同的集团和阶层必须分别看待。他研究了社会主义政党在

夺取政权以前和夺取政权以后对小农、中农、富农以及大地主所必须采取的政策。

恩格斯探讨了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应如何对待农民的问题。他并没有打算预先规定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集体农业轨道过渡的具体形式，因为这些形式要根据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的那些具体条件和情况来决定。因此，恩格斯只提出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对待小农的最一般的（基本的）政策。恩格斯写道：“……显而易见，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不会设想用暴力去剥夺小农（赔偿与否都是一样），像我们不得不对大地主所做的那样。我们的任务首先在于：将其私人的生产和私人的所有权变为协作社的生产和协作社的所有权，但决不是使用强迫的手段，而是凭藉示范和提供社会帮助的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那时候我们当然会有足够的办法，向小农显示出他们现在就应该懂得的好处。”

对南特土地纲领的批判不仅是对法国党的，而且也是对第二国际其他党的机会主义分子的一个打击，首先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分子的一个打击。当时，这个党的立场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还是先进的。在实施特别法的条件下，由于合法工作和地下工作的结合，由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党不仅没有脱离群众而孤立，而且还扩大

了和群众的联系，加强了对群众的影响。恩格斯在向《社会民主党人报》（特别法废除不久后这个报纸就停刊了）读者告别的信中总结了德国工人和他们的党反对特别法的英勇斗争。恩格斯在追溯1848年，追溯《新莱茵报》时，关于实施特别法这段时期是这样写的：“这同样是一种革命的时期，从那一刻起，即在维登代表大会上，党又重新恢复了，并重新‘用一切手段’——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开始斗争。”

统治阶级亲眼看到俾斯麦想藉特别法来使社会民主党脱离群众而孤立的企图破产了，因此，1890年1月25日国会便不拟再延长这个反对社会主义者的法律。现在统治阶级转而采取“新方针”，即采取“怀柔”策略，采取向工人运动曲意逢迎的政策。

随着特别法的废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条件又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党现在获得了合法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的可能性。

由于统治阶级策略的改变，党的策略问题又尖锐地提出来了。党内又重新出现了危机，这个危机和70年代末期反对社会主义者的法律实施时所发生的危机的性质几乎是一样的。

首先起来反对党的是：“左”倾机会主义者“青年派”（其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这个反对派是由一批以党的理论家和领袖自居的年轻的文学家和大学生所

领导的)。这一反对派不懂得利用合法条件的必要性，他们要求党放弃议会活动，责备党在保护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责备党犯了机会主义错误。

当《萨克森工人报》——“青年派”的机关报——企图宣称恩格斯和反对派是一致的时候，恩格斯对于这种“极端无耻的行为”给予了坚决的反击，并趁此机会详尽而彻底地批判了反对派的理论观点和策略。

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青年派”的理论观点是一种歪曲得不成样子的“马克思主义”。谈到这点的时候，恩格斯提到马克思关于70年代末流行于一些法国人中间的这种“马克思主义”所说过的一句话：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恩格斯严厉地批判了“青年派”的脱离实际的冒险策略。用他的话说，这种策略甚至能使一个最强的、拥有数百万党员的党葬送在它的一切敌人的大笑声中，并且完全是咎由自取。

恩格斯嘲笑“青年派”自以为在党内占有很大比重、起很大影响的这种自负和错觉。他给他们指出了—一个党员所应该走的道路，指出他们要成为领袖应该具备哪些品质。“应该让他们了解：他们所受的那种尚待自己加以彻底批判的‘学院式的教育’，完全不能使他们在党内获得领导干部的头衔和与之相适应的

职权；让他们了解：在我们党内，每一个人都应该从一个普通战士做起；让他们了解：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光是有写文章的本领或理论知识是不够的，甚至二者都确已具备，也还是不够；让他们了解：要担任领导职务，还需要很好地熟悉党的斗争的条件，完全通晓斗争的形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觉自愿地加入到战士的行列中。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他们这些受过‘学院式的教育’的人们应该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向他们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

这是恩格斯还在“青年派”表示否认议会斗争和开始公开反对党以前，就对他们进行的批评。在“青年派”变得更“左”的时候举行的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做出了决定：如果“青年派”的领袖们不服从党的决议，他们就必须退出党的队伍。反对派的代表们示威性地退出了党代表大会，最终地和党分裂了，“其中一部分滚到无政府主义方面去了”。

党内的“左”倾分子的活跃和统治阶级转而采取“让步”的这种情况都使得党内的改良主义分子和公开的机会主义分子积极活动起来。恩格斯早已预料到在特别法取消后党内机会主义右翼就可能采取进攻，福尔马尔的言行首先表现了这一点。福尔马尔认为政府的“新方针”是对工人真正友好的表现，他用下面

的公式来表示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用友好的手欢迎善意，用拳头打击恶意。”

福尔马尔认为统治阶级的政府能够“按照全体人民的利益”办事，他就以这种观点修改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理论。由此在逻辑上就推出福尔马尔放弃革命的结论，推出福尔马尔的这样的论断：将来的新社会一定是“始终不渝的和平发展”的结果。

当时福尔马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决不是孤立的。由于统治阶级策略的改变，党内小资产阶级的拉萨尔主义思想复发了，改良主义的幻想重新抬起头来。甚至党的一个公认的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也常常大谈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把任何谈论武装革命和国内战争的人都算做是无政府主义者。李卜克内西向恩格斯解释说，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

避免和政府发生新的尖锐的冲突，因为这种冲突会使社会民主党失去刚刚争得的合法地位。但是恩格斯向李卜克内西的这种言论提出了坚决的抗议。恩格斯在1890年3月9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写道：“你痛斥以任何形式，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武力，我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因为：一则，随便哪个敌人都不会相信你这种说法，他们不致于蠢到这种程度；再则，根据你的理论，我和马克思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因为我们从来不打算像善良的教友派信徒那样，如果有

人想打我们的右脸，我们就把左脸也挨上去给人家打……”

恩格斯越来越频繁地指出党的那位“理论家”——考茨基的特点，这些特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初次和考茨基认识的时候就看出来的。考茨基带学究气、经院习气，不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带有庸俗气，最后，如恩格斯在给阿德勒的信中所写的，“和真正党的运动缺少联系”。关于考茨基，恩格斯写道：“……是一个纯粹的学究和经院哲学家，他不但不能把复杂的问题弄清，反而把简单的问题弄复杂了。”

伯恩施坦也同样使恩格斯感到不安。伯恩施坦越来越暴露出：他极力想“摆脱”恩格斯的约束，“摆脱”恩格斯在过去，尤其是当《社会民主党人报》从瑞士迁到伦敦以后每天对这位编辑所起的影响。1893年10月12日，关于伯恩施坦，恩格斯这样写道：“他仍然没有做到他所应该做到的那个样子。他现在热衷于琐碎的问题，而且越来越像他那位在《国民报》（《Volkszeitung》）工作的英明的叔父了。”

最后，恩格斯说在所有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中评价最高的倍倍尔，虽然有很多优点，可是第一、他没有做党的理论家的足够才能，第二、他在和党内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中，不是始终表现得那么顽强、坚决和不妥协。

在这样的条件下就产生了一种危险：日益猖狂的机会主义分子也会影响到党将在1891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而用以代替旧的哥达纲领的纲领草案。因此，恩格斯认为现在是“干涉”和坚决打击机会主义的最适当的时候了。于是他就提议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NeueZeit》）杂志上发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这篇文章是在1875年专为党的领导者们写的，没有公开发表）。这个提议遭到了党的领导者，特别是《新时代》杂志的编辑考茨基的反对。由于恩格斯声言要在维也纳刊印这个文件，考茨基才发表了《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知道，发表这个文件，将会给予机会主义者多么沉重的打击，因为马克思在这个文件里彻底批判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幻想，极其详尽地阐述了自己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关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观点。恩格斯在1891年1月17日给在左尔格的信中写道：“《新时代》（《NeueZeit》）杂志第17期将给人们留下一个像炸弹爆炸一样的印象，它将刊登马克思对于1875年的纲领草案的批判。这将使你满意，但在德国却会引起许多人的狂怒和愤恨。”恩格斯说得对，“炸弹使机会主义阵营感到惊慌并的确引起了他们的愤恨。”

考茨基在恩格斯的压力之下发表了《哥达纲领批

判》，同时却慌忙表明自己不同意马克思对拉萨尔所做的评价。考茨基在《新时代》（《NeueZeit》）杂志第21期中写道：“马克思对拉萨尔的看法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看法。”考茨基转载了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Vorwärts》）上的一篇反对《哥达纲领批判》的文章作为“解毒剂”。在这篇看来像出于李卜克内西手笔的文章中，竟有这样的妙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拉萨尔主义者，他们是社会民主党人。”这篇文章和《哥达纲领批判》相反，是庇护那些作为哥达合并大会的基础的机会主义原则的，“大会的目的是使两个派别合并，而不是制定科学原则。应该选择一下，是要开一个制定教义的会议，还是开一个社会主义的合并大会”。这就是对于把理论和实践割裂开来、追求无原则的、不惜任何代价的团结的最典型不过的表述。这种割裂和团结以后就成了第二国际政党的特点。

同时，社会民主党代表格里林伯尔格尔在国会讲坛上声称：党并不同意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恩格斯认为必须向机会主义阵营投掷第二枚炸弹——给马克思所著的《法兰西内战》这本小册子写一篇序言。恩格斯在这篇序言里反对那种不仅流行于德国资产阶级中间而且也蒙蔽了许多德

国工人的“迷信国家”的心理。和那种把国家看做是实现永恒真理和伸张正义的工具的观点相反，恩格斯强调指出：“国家只是一个阶级用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就是在民主共和国里这种压迫也并不比在君主国里减少分毫。”恩格斯用巴黎公社的经验反驳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巴黎公社证明了：无产阶级必须摧毁整个旧的一贯被用来压迫自己的机器。他教导工人说：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在这方面应该学习巴黎公社的榜样。恩格斯用下面这些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分子的话结束了他给《法兰西内战》写的序言：

“近来社会民主党里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诸君，你们想知道这种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党的群众非常兴奋地欢迎恩格斯的这些议论，可是党内某些主张调和的领袖却对恩格斯表示愤怒和不满，甚至有一个时期和他断绝通信往来。可是恩格斯对于这种示威并不在意。有一次他写道：“如果你们以为，你们的微不足道的刺激能够刺穿我的锻炼得很好的老而结实的皮肤，那你们就错了。”

恩格斯急于给党内的改良主义和“议会痴”以新的打击。德国社会民主党新纲领草案的制定使他再度

获得机会猛烈地攻击“乞求和平的机会主义……”和由旧的泥坑“长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调。

恩格斯在批判应在1891年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上讲座的纲领草案时，详细地分析了纲领中的论证（理论）部分和政治、经济的要求。最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对政治要求所做的批判。

恩格斯在具有巨大国际意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两条战线的斗争中，主要是向改良主义者、“社会协调”的维护者、“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宣传者开火。他揭穿了那些冒牌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的凶狠的敌人的面貌。恩格斯在晚年仍然以自己所特有的全部革命热情投身于捍卫马克思主义主要的和基本的部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的斗争中。

同时，恩格斯还打击了那样一些人，这些人不考虑一定历史时期的特点，不懂得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教育工人阶级，使他们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能够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有可能合法地进行工作的情况下，恩格斯坚决反对那些否认必须利用“资产阶级的合法性”来扩大社会主义宣传、建立无产阶级组织、加强无产阶级的觉悟和团结的人。恩格斯反对那些促使党采取为时过早的行动的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家；为

时过早的行动只能使社会民主党遭到严重的打击，因为社会民主党正在合法的情况下，一步一步地为将来的革命决战，为社会主义革命争取越来越多的群众。

恩格斯警告党说，社会民主党已在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中获得越来越大的成就，拥护它的票数正在不断增长，这在一定的阶段，将会成为统治阶级的巨大的威胁，以致于总有一天，统治阶级会破坏他们自己所制定的资产阶级法律，转而以武力对待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发动内战。

果然，统治阶级很快就开始为它自己所制定的资产阶级法律而感到苦恼。1894年12月，有人在国会里以社会民主党阴谋组织政变为藉口，提出了反对社会主义者的新的法律草案。实际上，一部分统治阶级，尤其是大地主们自己，并不反对来一次政变，撕毁宪法，废除普选制，比非常法时期还要更加彻底地把社会民主党赶入地下。

1895年3月，正好是国会讲座用来对付政变的法律的时候，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一篇《序言》中证明了当时想来一次政变的不是社会民主党倒是统治阶级。恩格斯强调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合法性对社会民主党是有利的，正是社会民主党长时期以来所进行的坚决顽强的合法工作在群众中的影响日益扩大，才使统治阶级绝望地叫了

起来：“法律害了我们！”因此，统治阶级想刺激无产阶级，促使他们采取过早的行动，把他们骗到大街上去，以便使他们葬身于枪炮刀剑之下。

恩格斯在这篇《序言》里强调指出，自1848年和1871年革命以来，街头武装斗争的条件起了什么样的变化。日益强大的军队在装备上比以前优越得多了，铁路可以迅速地调遣队伍，大城市中新闻街区的又长又直的街道便于使用新式枪炮。

恩格斯在发表这篇序言的时候，不得不考虑德国党的领导方面的意见，他们坚决要求恩格斯考虑由于国会讨论对付政变的法律而引起的国内紧张局势，要求他在这篇序言里有些地方的提法要慎重一些。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3月25日给考茨基的信中写道：“我们的柏林朋友们被那个旨在对付企图推翻现存制度的人们的法律草案吓得动摇了，以致使我的文章有些减色。我对于这种动摇态度，在目前的情况下，毕竟不得不加以考虑。”

可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某些领袖看来，这还是不够的，他们竟然肆无忌惮地把恩格斯的序言加以歪曲。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Vorwärts》）没有征得恩格斯的同意就刊登了序言的摘录。这篇摘录，如恩格斯在1895年4月1日给考茨基的信中所写的，把序言“删改得好像我是一个不惜任何代价乞求

和平、遵守法律的人”，不难想象恩格斯在读到这篇摘录的时候是怎样的愤怒。恩格斯对李卜克内西歪曲他的观点的行为提出强硬的抗议，要求他在《新时代》（《NeueZeit》）杂志上重新刊登序言的全文，“以便消除那篇摘录给人家留下的恶劣印象”。

发表《法兰西阶级斗争》序言的这段令人愤怒的经过，迫使恩格斯不但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许多领袖提出最强硬的抗议，而且还要就这件事通知其他国家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尤其是拉法格。恩格斯在1895年4月3日给拉法格的信中写道：“李卜克内西和我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他从我为马克思的关于1848-1850年的法兰西的论文所做的《序言》中，摘出所有能为他那不惜任何代价乞求和平的、反对暴力的策略辩护的片段，近来这一策略他宣传得很得意，特别是现在当柏林正在准备特别法的时候，宣传得更得意。但是，这个策略，我只是为今天的德国提出的，而且附带有很多条件。在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决不能一成不变地采取同样的策略，而对德国来说，这个策略明天就可能成为不合时宜的了。”

后来，伯恩施坦之流的机会主义者歪曲事实并制造无耻谰言，说什么恩格斯在这篇《序言》——他临终前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中修改了自己的观点，走上了改良主义的道路。这些人不惜对一个毕生为无

产阶级专政而奋斗、无情地揭穿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危险性的人进行骇人听闻的诬蔑。

恩格斯认为能急剧地改变德国社会民主党斗争条件因而也改变其策略的因素之一就是日益临近的战争。他焦虑不安地注视着备战的情况，注视着马克思早在1870年国际总委员会的宣言中所预言的俄法亲近的情形，注视着组织三国同盟（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的情形。恩格斯强调指出，将来战争的规模和破坏力量都将是前所未见的，将来的战争和所谓“区域性的战争”，即个别国家之间的战争不同，将是世界性的战争。

虽然恩格斯在他一生的最后几年中提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某些新现象（股份公司、托拉斯等的产生），但是他不能察觉到当世界向新时代——帝国主义时代——过渡时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发生的主要变化，因而也就不能断定未来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斯大林在分析恩格斯著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时指出，恩格斯在说明未来的世界大战的原因时，漏掉了“一个后来起了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因素，也就是那时已经具有极重大意义的为争夺殖民地、销售市场、原料产地的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这一因素，忽略了作为未来世界大战的一个因素的英国的作用，忽略了德国和英国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一因素，这种矛

盾当时已经具有重大的意义，并且后来在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发展中起了差不多是决定性的作用”。对这一因素的忽略乃是恩格斯这篇论文的主要缺陷，并且还因此使本文产生了其他的缺陷。在恩格斯这篇论文中并没有“革命的失败主义和列宁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政策”的思想。

恩格斯把德国看做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在最近的将来就会成熟的国家，因而他认为如果沙皇俄国和法国一起战胜德国，那就会使德国工人运动大大倒退。因此，他认为：如果发生战争，德国社会主义者应该起来保卫国家。恩格斯强调指出，只有用革命的办法，只有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仿效1793年雅各宾战争的榜样来领导革命战争，夺得政权，保卫德国才会有真正的把握。恩格斯写道：“简言之，和平会保证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十来年以后获得胜利，战争则会使社会民主党要么就在两三年内取得胜利，要么就遭受彻底的失败，至少在15年到20年的期间抬不起头来。”

于是，恩格斯就号召一切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努力为维护和平而斗争，以便尽量推迟即将来临的战争。他指出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结束战争。“只有当欧洲各国人民都成为自己国家真正的主人时，在这些国家的人民之间才会出现真诚的国际合作”。

1914年开始的世界大战，和恩格斯在80年

代和90年代初所写的文章中论到的那种战争相比，具有不同的性质。可是，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还是企图假借马克思、恩格斯在截然不同的一去不复返的时代所采取的立场，来掩饰他们的叛变的策略，即支持“自己”政府所进行的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策略。

由于第一批革命战斗的时期的临近，恩格斯在晚年特别关心俄国国内的发展和俄国革命的前途。国际局势的尖锐化使他对俄国的情况更加关怀。

恩格斯在许多文章中证明：农民改革不但没有消除存在于俄国的社会矛盾，而且使这些矛盾更尖锐化了，使保留下来的封建残余更令人难以忍受了。关于1861年的农民改革恩格斯曾预言性地写道：“欧洲自由主义报刊所一致赞扬和歌颂的伟大解放法案，只不过是将来为革命打下坚固的基础，使这个革命成为绝对不可避免罢了。”

在19世纪上半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落后的、专制的、农奴制的俄国是欧洲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到了19世纪下半叶，由于农民的觉醒和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他们开始把俄国看做是给予欧洲革命强大推动力的国家。188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版所做的序言中写道：“俄国是欧洲革命的先进队伍。”

恩格斯像马克思一样，专心地研究了俄国的经济，

研究了俄国的科学和文学。1892年，恩格斯曾写信给《资本论》的俄译者丹尼尔逊，对后者刚寄给他一批俄文书籍表示感谢，他说，在这些书籍中“门得列也夫的著作特别使我感到兴趣”。由于恩格斯熟悉俄国的科学、俄国的先进社会思想，他对于俄罗斯人民的智慧和道德品质给予很高的评价。1893年10月，恩格斯给丹尼尔逊的信中写道：俄罗斯人民是“伟大的和具有高度才能的人民”。他相信这样的人民，相信他们坚韧不拔的性格，相信他们的不可征服的力量。当丹尼尔逊抱怨俄国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给俄国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灾难时，恩格斯就在回信时对他说道：“像你们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会经得起任何危机的。”对俄国革命青年在寻找科学的真理，寻找真正的革命理论时所表现的顽强的、自我牺牲的精神，恩格斯曾给予特别高的评价。马克思在世的时候曾经指出，他的《哲学的贫困》（1847年）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两书在俄国销路之广是任何地方比不上的。《资本论》的第一种译文是俄文这个事实，具有极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在获得许多材料证明俄国学者和俄国革命青年对《资本论》有浓厚的兴趣后，就做出结论说：《资本论》在俄国“比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更多的读者和受到更高的评价”。

恩格斯指出，俄国的不以人们愿望为转移的经济发展和工业革命、国内市场和商品关系的扩大，毁坏并且瓦解着村社；他指出，俄国经济上不平等的现象正在加剧，在农村除地主之外，还出现了高利贷者富农、土豪（这些字恩格斯通常是用俄文写的）；他指出，农民的无产阶级化正在进行着。恩格斯强调指出，在村社的条件下，这个无产阶级化的过程进行得特别缓慢，给人们的痛苦特别多。

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也还是不止一次地谈到村社的命运问题。在许多文章以及和俄国革命者的通信中，恩格斯指出：从他和马克思一起写《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时起，俄国村社所有制的瓦解过程已经前进了一大步，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俄国发生的这些变化已经使恩格斯不能重复他和马克思在1882年对村社命运问题所做的那个回答了。恩格斯没有断言村社是否还那样完整无恙。他这样写道：但是，要从这种村社完整无恙地保存点什么东西下来，那就必须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

恩格斯认为：俄国革命者，无产阶级的代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就是俄国革命胜利的保证。恩格斯在给维拉·查苏利奇的信中写道：“在我看来，坚定不移的、彻底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就是马克思

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理论。只要把马克思的理论和一个国家经济、政治条件结合起来，就能够找出这样的策略。”

恩格斯在许多书信中，极力纠正《劳动解放社》的严重错误，帮助他们“找到”在俄国条件下所必须采取的“策略”。

恩格斯第一个警告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要他们提防和马克思学说的整个精神相违背的教条主义和书生气。俄国文学家、社会民主主义小组的参加者阿·沃登回忆起1893年在伦敦和恩格斯会见时的情况，他叙述道，在谈话中，恩格斯希望“俄国人——不仅仅是俄国人——不要生硬地搬用马克思和他（恩格斯）的学说，而应该像马克思那样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名词才有“存在的理由”。

对于《劳动解放社》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恩格斯给予极高的评价。同时，他指出必须对许多问题，首先是俄国的土地问题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土地问题的研究对于发展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对于地租学说，以及对于俄国的实际革命活动都具有极大的意义。恩格斯认为最好由普列汉诺夫来从事俄国的这一基本问题的研究工作。但是大家知道，这个任务是由列宁完成的。

恩格斯既没有活到俄国成立了真正无产阶级政党

的时候，也没有活到成为历史转折点（他曾屡次这样预言过）的俄国革命的时候。恩格斯希望还赶得上“看一看20世纪”，还能活到欧洲重新走上革命道路的时候，但是他的愿望并没有实现。

恩格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对工人阶级即将到来的胜利，对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共产主义的纪元——的必然到来，怀着不可动摇的信心。当意大利《新纪元》杂志的编辑请求恩格斯简要地为即将到来的新纪元的基本思想下一定义，来和被但丁称为“一些人作威作福，而另一些人受苦受难”的旧纪元相对比时，恩格斯就用《共产党宣言》中带预言性的话回答他：“代替那存在有阶级以及阶级对立性的资产阶级旧社会而起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大家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协会。”

虽然恩格斯在无情的飞逝的岁月中已度过了70个年头，但他仍然像青年人一样地朝气蓬勃和愉快乐观。他的身体还是灵活而强健的，胡须稍微有些灰白，头上找不出一根白发，从这一切看来他最多不过20岁。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这样描写70岁的恩格斯：“如果从他的头发看来，他比我们中间大多数人都年轻。”恩格斯在精神上还更要年轻，他还是那样脑筋灵活、精神愉快、饶有风趣。爱琳娜说，就这方面看来，恩格斯是她所认识的人中间最年轻的。爱琳娜谈

起，恩格斯在1888年和她、她的丈夫、恩格斯的朋友萧莱马一起游历美国的时候，他是最愉快、最活泼的旅伴和交谈者。不论什么样的天气他都要在甲板上散步，并且有一个不变的习惯，即遇到路上有什么障碍的时候，决不绕过去，而是跳过去或爬过去。除去游历美国之外，恩格斯还和萧莱马一起在1890年游历了挪威。

恩格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始终具有巨大的工作能力和充沛的精力。他继续进行着如此巨大的工作，这些工作，就其繁重程度来讲，是十个人都难以完成的。只要看一看恩格斯接到的邮件就会使人惊讶：每天都有一大堆各种欧洲文字的报刊和书信送到瑞琴特公园路的一所小房子里去。他总能抽空看完这些报刊和书信，评论发生的一切事件并回答来信。

恩格斯工作时也仍旧像往常一样地专心致志，干净利落，有条不紊。恩格斯住的地方永远是整齐清洁，秩序井然。“在他的两间宽大和光线充足的房间里，靠墙的地方排列着许多书架，地板上没有一片纸屑，而书籍，除了放在书桌上的十来本以外，都放在应放的地方……他也同样的非常注意仪表，他总是精神抖擞，衣着整洁，好像随时准备参加阅兵典礼似的……我从未见过一个像恩格斯这样的人，一套衣服能穿得如此久而一直保持原来的式样，看起来仍像新的一样。

他自己省吃俭用，绝不乱花一个钱，但是他对党和对求助于他的党内的同志，则无限慷慨”。

恩格斯的家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拜会恩格斯的场所。在这两间房间里，充满了各种语言的声音，特别是在星期日，在这个恩格斯照例接待宾客的一天，这种声音更为厉害。凡是有幸到过这里的人，一生都会记得这些难忘的星期日的夜晚。像拉法格所说的恩格斯聪明机灵，谈笑风生，他给这些夜晚带来了活跃、热烈和愉快的气氛。

尽管来拜访恩格斯的人是如此的多，但恩格斯并不接待所有来拜访的人。许多年来丰富的政治经验使他已惯于警惕地对待陌生的或是值得怀疑的人。对于那些叛变了无产阶级事业的可耻的人，他就毫不留情地把他们赶走。爱琳娜·马克思写道：“有一样东西恩格斯是永远不会饶恕的那就是伪善。一个不老实的人，尤其是叛变了党的人，是永远得不到恩格斯的一点宽恕的。”

虽然恩格斯对于国际工人运动有难以估计的贡献，但他仍旧像以前一样，非常朴素和谦逊。各国社会主义政党把他当做自己公认的领袖而尊敬他关怀他，但他总是解释说，这主要应归功于马克思。当恩格斯70寿辰的时候，祝贺他的电报、信件、礼物、党报上的文章如雪片飞来。他强调指出，他认为这些

荣誉主要不应当归功于他自己。他写道：“我既有幸收割一位比我更伟大的人——卡尔·马克思所种下的光荣和荣誉，我只有保证用我的余生来积极地为无产阶级服务，但愿在将来尽可能地不负大家给予我的荣誉。”恩格斯并且请求把给予他的荣誉，当做奉献于马克思墓前的荣誉的花圈。

恩格斯以敬仰的心情悼念马克思，以他们共同为之奋斗的事业的成就而自豪。他严厉地打击那些企图诽谤和诬蔑马克思从而损害国际工人运动的人。布伦坦诺诬蔑马克思，说马克思在引格莱斯顿的言论时是歪曲了的。恩格斯根据许多文件揭露了这种恶毒的诬蔑。他不仅忠心耿耿地维护着马克思的死后的声誉，而且也同样地维护着马克思的妻子燕妮的死后声誉。回击任何对这位女性进行诬蔑的企图。如恩格斯在其墓前演说中所说的，这位女性“不但分担了她丈夫的命运、劳动和斗争，而且是积极地、专心致志地、热情似火地投身于其中”。恩格斯把对马克思的热爱也转寄于马克思的孩子们的身上。当有人非难爱琳娜的丈夫艾威林而间接涉及爱琳娜时，恩格斯为了保护她进行了一场极大的斗争。他在给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写道：“马克思生前曾嘱托过我，要我在他死后像他自己那样关照他的孩子，并尽我的力量维护她们，使她们免受任何诬蔑。我要维护她们，哪怕

我必须对付50个执行委员会，我也仍然要这样做。”

恩格斯以极其尊敬和感激的心情对待马克思的最忠实的朋友和老女仆——犹如他家庭一员的海伦·德穆特。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在回忆德穆特的时候，也说她是“一位最崇高的女性”。马克思死后，海伦（琳蘅）就搬到恩格斯家里来。那时恩格斯在妻子莉希（死于1878年）死后过着独身生活，海伦就替恩格斯料理家务。恩格斯在1890年11月5日，即琳蘅死后第二天，给左尔格的信中谈到琳蘅在他和马克思的一生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时写道：“我和她是留下来的最后两个1848年以前的老战士。现在我又是一个人了。马克思在长时期内，我在这七年中间能安静地工作，这大部分要归功于她。”

恩格斯因看到他的老战友越来越稀少，无产阶级的老战士都相继去世了而感到忧伤。他自己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天还是希望他能够活到“无产阶级获得胜利、阶级对抗和各国人民之间的战争已被消灭、在各文明国家里和平和幸福已经实现”的时候。他还希望积极参加将来的决战，只是惋惜再不能骑马了。他还希望用他剩下的最后力量来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恩格斯在答谢对他的生日的祝贺的时候写道：“当我不能进行斗争的时候，就让我死去好了。”

然而岁月是无情的。1894年12月4日，他

写信告诉左尔格，说他虽然还精力充沛，对工作的渴望丝毫未减，并且还具有相当的工作能力，但是他在这 75 岁时，已经不如以前那样健壮了。

在恩格斯写这些话的时候，他的旧病——喉头癌已经损伤了他的身体，以前，医生一直隐瞒着他。很快病情就急剧地恶化了，他感到了剧烈的疼痛。据当时到伦敦来的阿德勒说，恩格斯是“以斯多葛精神，甚至以幽默的精神”忍受这种疼痛的。恩格斯虽然不知道病的诊断情况，可是毕竟感到自己已经接近生命的终点。他在死亡面前表现了勇敢镇静的态度。

1895年8月5日晚11时左右，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与世长辞了。

遵从恩格斯的吩咐，他的葬仪举行得简单朴素。参加追悼会的只有从各国来的一些亲近的朋友，一共约有80个人。其中有德国党的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辛格尔，有法国党的拉法格，有领导英国工人运动的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奎尔奇，有比利时的安赛尔，有俄国的维拉·查苏利奇和斯捷普尼亚克（谢·米·克拉夫钦斯基），有意大利的瓦列拉等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拉法格、赛姆·穆尔等都发表了演说。

恩格斯的遗体是遵从他的遗嘱进行火葬的，骨灰罐被送到恩格斯心爱的休息地方——伊斯特勃恩海岸。

在一个暴风雨的秋日，惊涛骇浪吞没了他的骨灰。